

● 中国历史知识丛书 ● 主编 程耀东 ●



ZGWHHSZS

商周青铜文化

李先登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 主编 任继愈 ●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商周青铜文化

李先登

060309



定价：000631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0 号

责任编辑 王 君

封面设计 王 岐

版式设计 任志珍

责任校对 胡林妮

商 周 青 铜 文 化

李 先 登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960 毫米 32 开 4.625 印张 61 千字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 7-5035-0509-5/G·25

定价: 2.30 元



春秋青铜禁(河南浙川出土)



商代后母戊鼎(河南安阳出土)

商代小臣兕犀尊
（传山东梁山出土）



商代虎食人卣
（传湖南安化出土）





商代双面玉人
(河南安阳出土)



商代铁刃青铜铈
(河北藁城出土)



商代原始瓷尊
(河南郑州出土)

春秋莲鹤六壶（河南新郑出土）



西周毛公鼎
（传陕西岐山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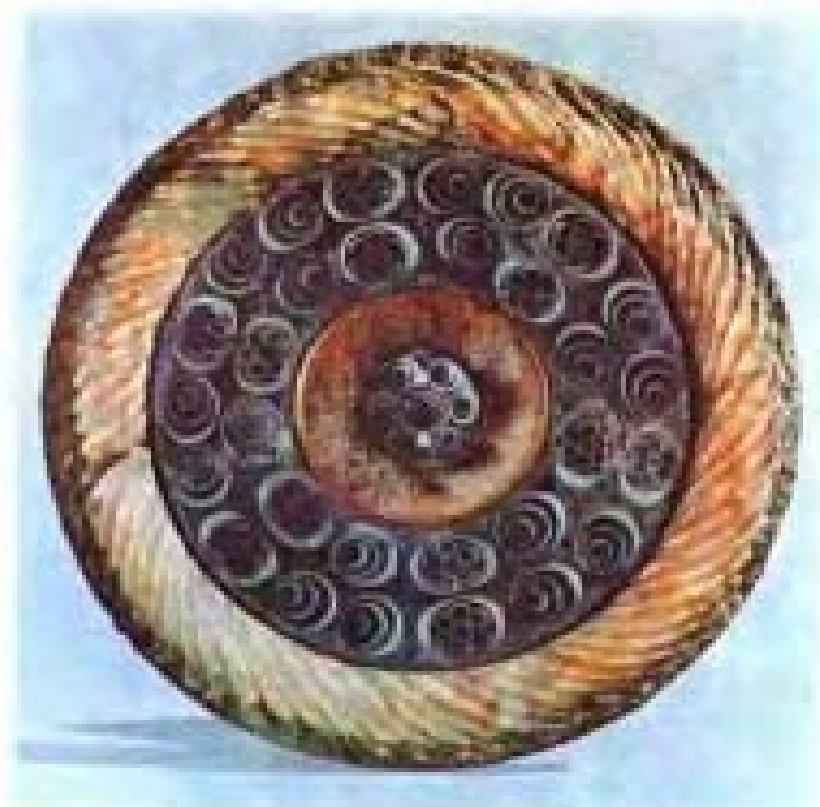


西周利簋

(陕西临潼出土)



战国青銅尊 (湖北随州出土)



（传河南洛阳出土）
战国嵌玉嵌琉璃铜镜



春秋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出土）



战国彩漆木雕小座屏(湖北江陵出土)



战国凤鸟花卉纹袍(湖北江陵出土)



「北京平谷出土」
夏家店下层文化金耳环



「云南楚雄出土」
春秋铜鼓



「江西清江浦出土」
商代吴城文化青铜铙

编者献辞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财富。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曾对人类文化做过贡献,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它们多衰落了。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续性;首先,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 56 个民族的文化)长期

的、不断的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其次，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至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基本精神是指刚健自强的革新进取精神，注重道德教化，强调民族凝聚意识，以及重视历史智慧等几个主要方面。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泛地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要让中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即了解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与它的优良传统，从

而给爱国主义打下稳固的思想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创造条件。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

我们设计了历史、考古、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典章制度、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110个专题,希望这一套丛书从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如果海内外读者能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满足了。

对于本书的批评与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委会

1991年2月22日 北京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主编：冯钟芸 游铭钧 焦树安*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戴念祖	郭齐家	金宜久
李思敬	卢海燕*	骆桂明*
马樟根	欧阳中石	庞 朴
戚志芬	任雪芳*	沈心天*
谭其骧	汤一介	王世民
王兆春	吴恩扬	吴 可*
吴良镛	严如炳	张华纲
张明华*	张习孔*	赵 靖
赵匡华	钟碧惠	周 强
朱光潜		

〔有*者为执行编委〕

目 录

一	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	1
二	商代的青铜文化	12
1	青铜生产工具与武器的广泛 使用	13
2	中国古代特有的青铜礼器	19
3	原始瓷器的出现	27
4	精美的玉石器	28
5	雕花木漆器及牙器	29
6	规模巨大的城市	30
7	随葬有大批青铜器的奴隶主 贵族墓葬	34
8	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 文字	37
三	西周的青铜文化	40
1	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	41
2	青铜武器的改进与青铜车马 器的新发展	52

3	丝织品的初步发展	54
4	建筑技术的进步	55
5	等级制度鲜明的墓葬	58
6	新中国建立以后新发现的西 周甲骨文	61
四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63
1	铁器开始逐步应用	64
2	青铜工艺的灿烂辉煌	66
3	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和 水陆攻战纹的出现	69
4	滕器铭文的大量出现	72
5	各地区青铜文化的大发展	73
6	列国城市的兴起	79
7	诸侯国君墓葬的发现	84
五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88
1	铁工具的普遍使用	90
2	青铜乐器的高度成就	92
3	青铜货币的大发展	94
4	青铜度量衡器的出现	97
5	铜镜、带钩与铜灯的普遍应用	98
6	玺印、符节的出现与使用	101
7	丰富多彩的丝织品	103
8	发达的漆器工艺	104

9	列国都城的进一步发展	106
10	诸侯国君墓地的发现	110
11	简牍、帛书和帛画	114
六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117
1	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与夏家店上层文化	117
2	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寺洼 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	121
3	四川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 化	124
4	江西的吴城文化	127
5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128
6	云南的青铜文化	131

一 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

铜（Cu）是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的金属。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天然的纯铜块，呈紫红色，所以又称为红铜。它们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早在几千年前人类使用磨制石器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采集石料制作石器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纯铜块，并把它们采集来，按照制作石器的方法，把它们锤锻、打磨成为小刀、小锥或小件装饰品来使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铜器。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用天然红铜制成的铜器是在土耳其南部恰约尼遗址发现的公元前七八千年的打制的铜针和铜锥。

在自然界还存在着铜矿石，常见的有孔雀石，这是一种氧化铜 $[\text{CuCO}_3 \cdot \text{Cu}(\text{OH})_2]$ 矿，因其颜色呈蓝绿色，很像孔雀的羽毛，因此引起人们的喜爱，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把它们采集来制作项链等装饰品。后来人们发现，孔雀石偶然掉在炭火中，经高温会熔融成为铜液，冷却凝固时可

以随意成形。这种现象不知重复发生了多少次,经过漫长的岁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终于发明了用孔雀石加木炭冶炼并铸造红铜器的技术,从此,红铜器开始普遍出现了。因此,这个时期又被称为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例如埃及在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的格尔塞文化时期就有了冶铸的红铜刀、匕首、斧和铤等。在中国,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约为公元前2085年的冶铸的红铜铃。

但是,红铜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所以,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后来,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又发现了锡矿石,常见的有锡石,这是一种氧化锡(SnO_2)矿;并学会了用锡石加木炭冶炼出锡(Sn)的技术。在人们掌握了冶铜术与冶锡术的基础上,进一步,人们又发明了用红铜加锡熔炼为青铜合金的技术,并且认识到青铜比红铜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具体来讲,青铜的优越性首先是硬度大。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度计的35度,加锡5%,其硬度就提高为68度;加锡

10%，即提高为 88 度。并且经锤锻后，硬度可以进一步提高。例如加锡 10% 的青铜，经锤锻后，硬度增至 228 度。其次，青铜熔液流动性能好，凝固时铸造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刃部锋利、轮廓分明、花纹纤细的器物。第三，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可以长期使用与保存。此外，青铜器用坏了以后，还可以回炉重铸。

由于青铜具有上述优点，所以，适合于制作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因此，古代的人们在发明了青铜冶铸术以后，就广泛地使用青铜来制作各种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等。而青铜器一旦在生产 and 生活中广泛应用，就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给农业及其它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锐利的工具，促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促使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促使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分工，促使手工业内部进一步分工，促使整个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其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军事、文

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社会的整个面貌大为改观。这就是说,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促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发展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即从石器时代飞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

总之,青铜就是以铜为主(基)的合金的一种,古代青铜器主要是铜与锡的合金,此外还有铜与铅(Pb)的合金等。必须指出的是,青铜在古代原来的颜色大多是金黄色的,由于经过长期腐蚀,表面往往生成一层青绿色锈,所以今天大家称之为青铜。

青铜时代就是人类使用青铜制作主要的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的时代,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继石器时代之后的第二个时代,是人类使用金属的第一个时代。在青铜时代,青铜器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占有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人们才称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时代为青铜时代。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世界各国都经历了青铜时代。埃及在中王国时代(公元前 2133—前 1786 年)出现了青铜器;新

王国时代(公元前 1567—前 1085 年)青铜冶铸业达到全盛,用青铜制作生产工具、战车及庙门上的饰件等。在两河流域南部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2700—前 2371 年)已经出现了青铜器,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2113—前 2006 年)青铜器开始流行。印度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是公元前 2350—前 1750 年的哈拉巴文化,青铜器有锄、镰、刀、斧、剑等。并且,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都在青铜时代进入了文明时期。

古代中国,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早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夏代时期就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古代文献上有夏代铸九鼎的传说。如《史记·封禅书》:“(夏)禹收九牧之金(铜)铸九鼎,皆尝亨鬻(shāng 伤)上帝鬼神。”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探索夏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在传说的“禹都阳城”的所在地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公元前 1900 年(夏代初期)的青铜容器残片。残高 5 厘米,残宽 5.5 厘米,厚 0.11—0.15 厘米,重 35 克,表面有绿色及黑褐色锈,呈弧状,下部

有转折,可能是铜鬲(guī 规)的腹底部残片。经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史研究室进行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是含锡7%的青铜制品。此外,在河南临汝煤山夏代初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已能使用多次的熔铜坩锅残片。以上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夏代确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问题正在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

下面介绍一下什么是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工作揭示的青铜时代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这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青铜时代的遗物,主要是指青铜器,此外还有陶瓷器、木漆器以及玉器、石器等等。另一个大的方面是当时人们活动留下的遗迹,包括房屋、城市及墓葬等等。除物质文化以外,也包括当时人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例如文字与艺术等。

最后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过程。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制造青铜器主要分为采冶与铸造两个大的工艺过程。第一步是采冶,即首先分别采取铜矿石和锡矿石,然后加上木炭,分

别冶炼出红铜和锡。中国古代铜矿蕴藏丰富,据春秋末、战国初的《管子·地数篇》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又据战国时期的《周礼·地官》记载,当时还设有管理矿山的矿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辽宁昭乌达盟林西、江西瑞昌铜岭、安徽南陵、铜陵等地发现了古代采冶铜矿遗址。现以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作一典型介绍。大冶铜绿山遗址在大冶县西北3公里处,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储存有丰富的高品位的孔雀石铜矿,从1973年起开始考古调查发掘,已发现地下采区7处,其时代主要是春秋、战国至汉代。当时是从地面挖掘竖井及斜井以达到地下矿层,然后开挖平巷和斜巷等进行开采。井巷使用木质框架支护,并已采取利用井口的不同高程产生的气压差来自动通风,用泄水槽、储水井及木辘轳等组成的排水系统来排水,以及用燃烧竹篾在井下照明等技术,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及高度水平。在井巷中还发现了春秋时期

的采掘工具大型铜斧形凿、铜铤、木铲、木槌、木瓢、竹篓及绳索等。再有,当时是将采掘的铜矿石就地冶炼成红铜,在矿井附近

就发现了10余座冶铜竖炉。其中春秋时期的冶铜竖炉高2.7米,呈腰鼓形,最大直径1.6米,是用红粘土、高岭土和石英砂等混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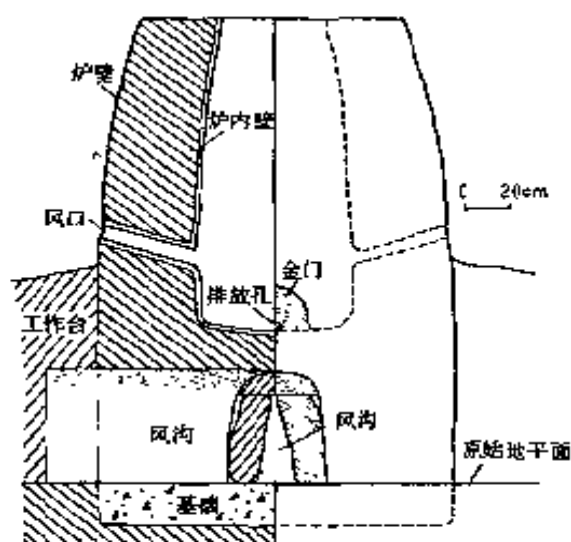


图1 湖北大冶铜绿山春秋冶铜竖炉

夯筑而成。炉缸上部设有排渣及出铜的金门及鼓风口,底部有通风沟(图1)。通过模拟试验,此炉已经可以连续加料、持续生产,每炉日产粗铜300公斤以上。在铜绿山遗址发现了古代炼铜渣40万吨,估计这里曾生产出8—12万吨铜,其产量之巨在古代世界是不多见的。

第二步是合金铸造。这又分为合金、制

范、浇铸三个方面。第一，合金。就是根据所制器物的需要将铜与锡按一定比例配合在一起，放在熔铜炉中加热熔化，从而得到所需要的青铜溶液，然后就可以进行浇铸了。关于青铜合金的配比，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记载说：“六分其金（铜）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即铜占85.7%，锡占14.3%）；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即铜占83.4%，锡占16.6%）；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即铜占80%，锡占20%）；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即铜占75%，锡占25%）；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即铜占71.4%，锡占28.6%）；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即铜占66.7%，锡占33.3%）。”通过今天我们对于古代青铜器的化验分析，除鉴燧（铜镜）之剂不符外，其余基本上是符合的，而且是合乎科学道理的。这是中国古代人民铸造青铜器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合金规律的文献记载。

第二，制范。就是制作铸造青铜器用的陶范。中国古代铸造青铜器主要用陶范，故

称为范铸法,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的特点。具体来讲,第一步是制模,就是用泥土制作一件与欲铸造的青铜器同样大小的模型,将花纹和铭文都要在上面刻好。然后将泥模阴干,再用火烘烤使其坚硬。第二步是翻制外范。即把用水和好的夹有细砂及细碎的植物茎杆的泥片捺印在泥模上,待半干后,按器物的特点,用刀分割成几块取下,阴干后烘硬,制成为外范。第三步,制作内范。即用泥土照泥模形状面减去欲铸青铜器之器壁厚度制成内范,并阴干烘硬。第四步,合范。即将上述已制好的内范与外范组装好,外面用绳索捆好固定,再用厚泥包裹,并在上面留出浇铸青铜溶液的孔道(俗称浇口)及排出范内空气的孔道(俗称冒口)。这时就可以进行浇铸了。

第三,浇铸。就是将已熔化好的青铜合金溶液注入合范之内,待铜液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并将已铸好的青铜器进行打磨修整,至此,青铜器的冶铸过程就全部完成了。

此外,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还使用了失蜡法。例如 1978 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春

秋时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禁（承托成组青铜酒器的器座），高28厘米，长107厘米。扁体中空，禁面呈长方形，四周攀附12只立雕伏兽，下面有10个立雕的兽足。其周边透雕的花纹由内部多层互不连接的铜梗分别支撑，玲珑剔透。经过研究，就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失蜡法就是首先在泥做的内范的外面敷上一层虫蜡（内掺松香和油脂等），用这层虫蜡做成欲铸的青铜器的原大模型，并在蜡上面雕刻出精细的花纹。其次，用调好的细泥浆一层层淋上去，最后形成泥质外范。在外范外面再用厚泥包裹好，并预留出浇铸口与出蜡口。然后再加热烘烤，使夹在内范、外范之间的蜡模融化，蜡液由出蜡口流出。最后由浇铸口将青铜溶液注入，待冷却凝固后，拆下外范及内范，一件青铜器就铸成了。由于虫蜡易于雕镂，因此可以制作花纹层叠、十分繁缛瑰丽的器物。浙川下寺青铜禁的发现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很早就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国家之一。

二 商代的青铜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的时候,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首领大禹,因为领导各族人民疏导治理洪水获得成功,被推戴(史书上称为“禅让”)为天下的共主。禹死后,传位于其子启,废止了禅让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夏代开始进入了青铜时代。但是,目前关于夏代的物质文化情况,考古工作者正在探索研究之中,争论也比较大,本书予以从略。

大约在公元前 16 世纪时,夏代最末一个王——夏桀十分暴虐,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首领汤,乘机起兵灭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商代时期中国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商代晚期出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时,青铜生产工具和武器已经广泛使用,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礼器

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器类已经具备,造型浑厚,纹饰繁缛,其中酒器特别发达。其它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原始瓷器出现。城市规模巨大,奴隶主贵族的墓葬随葬了大批的青铜器及其它物品。并且,此时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等。

1 青铜生产工具与武器的广泛使用

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冶铸业已有了高度的发展。在河南安阳苗圃北地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以上,熔铜炉直径已达0.83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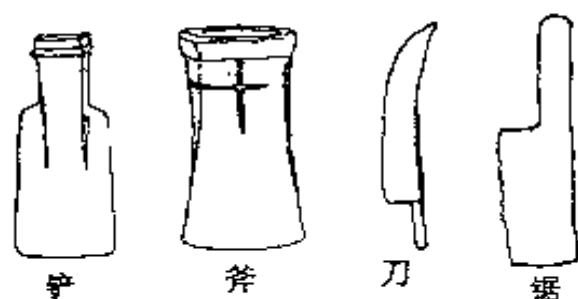


图2 商代青铜生产工具

出土陶范及陶模19000余块,主要是青铜礼器范,其中一件鼎壁范长达1.14米,比著名的后母戊(司母戊)鼎还要大。

这时,已经广泛地使用青铜来制作农业生产工具与手工业生产工具(图2),从而使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促使商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农业生产工具有铜耒(jué 决)、铲和耜(sì 四)。耒,是刨地破土的工具,略呈长方形,体厚重,下端为双面刃,上端有方釜(qióng 穷),用以安装曲折形木柄,其使用方法类似于今天的镐。1959年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铜耒,高6.3厘米,弧刃,上部有十字形纹饰。在郑州南关外商代中期铸铜遗址里曾出土大量的铸造青铜耒用的陶范,说明当时铜耒的生产量是很大的。铲,是起土工具,体呈长方形片状,下端为刃,上端中间伸出为柄,柄上端有长方釜,用以安装直木柄,其使用方法类似于今天的锹。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铲,长22.45厘米,刃宽8.5厘米。耜,是起土用的农具。中国古代农业起土工具主要是耒耜,一般是木质。铜耜系套在木耜头部使用,体略呈长方形,扁圆中空,下端为弧形刃。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

商代中期铜耜,长17厘米,刃宽约10厘米。

在商代,渔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古发现用青铜制作的渔猎工具主要有鱼钩及镞(箭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商代早期铜鱼钩,长约2.7厘米。镞既是渔猎工具,更主要的是作为武器使用。

用青铜制作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斧、斨、凿、锯、刀(削)、锥和钻等,它们主要用于制作木器。斧,是砍伐工具,一般为长方形,下端为双面刃,上端为长方形釜,用以装直木柄,在直木柄上再装横木柄,使用方法和今天的斧子相类似。有的上端侧面有一个半环形耳。例如1974年河南灵宝东桥出土的商代晚期铜斧,长12厘米,弧刃。斨,古代称为斤,用于砍削木料,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刨子。体呈窄长方形,下端为单面或双面刃,上端为釜,用以装曲折形木柄。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斨,长13.5厘米,刃宽4.1厘米。凿,体窄长,下端为单面刃,上端为釜,用以装直木柄,用于凿孔或开槽。1956年郑州

二里岗出土商代中期铜凿，长 18.2 厘米。锯，用于截断木料。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锯，呈刀形，体下刃为锯齿，后部有柄，长 14.7 厘米。刀，小的称为削。一般为凹背弧刃，后有直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刀，长约 15 厘米。同墓出土的铜削，柄端呈圆环状，长 13.9 厘米。锥，穿孔用。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商代早期铜锥，体扁平，并向一侧弯曲，四棱向前聚成锥尖，长约 8.5 厘米。

上述这些青铜生产工具远比石器锋利耐用，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由于广泛使用了青铜生产工具，就使商代的木器制作业、制车业以及骨器、牙器的雕刻等有了很大的发展。下面就以制车业为例予以介绍。

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奚仲发明了车子，但是夏代的车于迄今尚未发现。而商代的木车在考古发掘中已屡有发现，现在已经能够据以复原商代木车的结构。其特点是双轮独辕（辀），辕前端缚有衡，衡上系轭，用以驾马。为了坚固与美观，在木车及马头上配有青铜构件或饰件，称之为车马器。主要有安装在车轴两端防止车轮脱出的车轂

(wèi 卫)、铜
 軛饰以及马头
 上用皮条穿接
 起来的铜衔、
 镳(biāo 标)、
 当卢与铜泡等
 (图3)。商代
 的车子主要是
 用来作战与狩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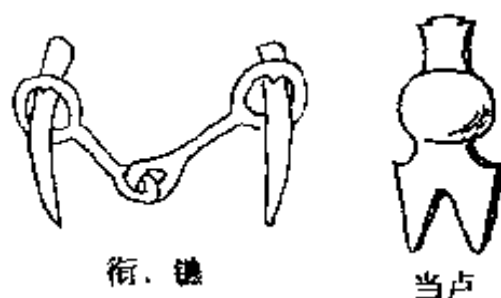


图3 商代青铜车马器

商代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统治,用
 当时最先进的青铜
 制造了大量的武
 器。考古发现的商
 代青铜武器有戈、
 矛、刀、钺、胄(zhòu
 宙)、镞和弓秘(bì
 必)等(图4)。商代
 的青铜武器不但远
 较石质武器锋利、
 坚固耐用,而且数
 量很大。例如在安
 阳殷墟一座商代晚期王陵的墓道中,就发
 现有随葬的铜戈69件和成捆的铜矛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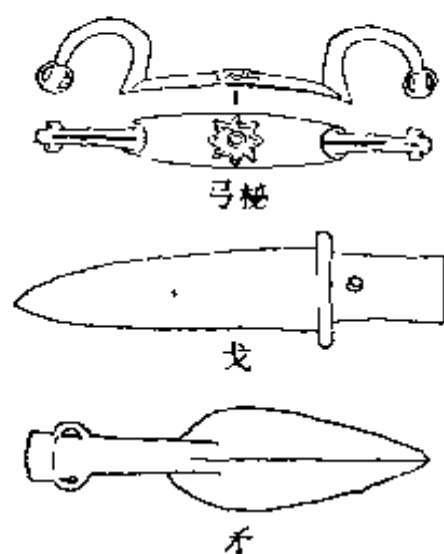


图4 商代青铜武器

件以及铜冑数十件等,说明商王用青铜武器武装了大量的军队。甲骨文记载,商王一次出兵 3000 人,甚至多达 5000 人。

戈,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青铜武器,可能是由石镰发展来的,是捆绑在长木秘(柄)上来使用的,主要用于勾杀。商代的铜戈有直内、曲内、釜内三种,后来又发展出短胡一穿、二穿的戈等,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矛,用于刺杀,套在长木秘前端来使用。刀,是用于砍杀的武器,装在木秘上使用。有的很大,刀尖上翘,背脊上有扉稜。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铜刀,长约 80 厘米,宽约 12 厘米。钺,体扁平,宽弧刃,用于斩杀,既是兵器,又是刑具。有的个体很大,制作精美,用以代表商王或其臣属的征伐与刑戮的权力。例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铜钺,平肩,肩部有两个长方形穿,直内。钺身上部饰双虎欲吞食人头的纹饰,人头置于两个张大的虎口之间。钺身一面中部并有铭文“妇好”二字。长 39.5 厘米,刃宽 37.3 厘米,重 9 公斤。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河北藁城台西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发现了商代晚期的铁刃铜钺。藁城台西

铜钺，残长 11.1 厘米，宽 8.5 厘米。钺身用青铜制成，并饰有两排乳丁纹。刃部已残，经鉴定系用陨铁锻打而成，说明中国人民早在商代已经开始利用陨铁。冑，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头盔，是保护头部用的。有的顶部有圆管，可以插丝纓或羽毛。弓箭，是远射的武器，弓及箭杆一般用竹木来作，不易保存。商代的箭头（鏃）一般用青铜制作，主要是宽双翼式。鏃是一种消耗性武器，商代用青铜来制作鏃，反映当时青铜的生产量已是相当大的了。商代的青铜武器中常见的还有一种弓形器，实即弓秘，用以缚在弛弓的外面，以保持弓的弧度。

2 中国古代特有的青铜礼器

中国古代不仅用青铜来制作生产工具与武器，而且还用来大量制造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使用的器具。而且这些奴隶主贵族用于宴飨、祭祀、丧葬等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功能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使用者身分等级的作用，是其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因此，称为礼器。青铜礼器是

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上其它国家古代青铜器的显著特点。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经发展成熟,主要器类已经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及乐器四大类。

食器中最主要的是鼎。铜鼎是仿陶鼎而来,大多是圆腹、三足、两耳,少数是方形四足,是煮肉与盛肉的器具,是祭祀与宴飨中必不可少的用器,因此也就成为最重要的礼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据《史记·封禅书》等文献记载,夏禹铸造了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以后“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左传·宣公三年》)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1939年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

部饰夔(kuí 葵)纹与兽面纹,腹内壁有铭文“后母戊”三字。形体巨大厚重,高 133 厘米,口长 79.2 厘米,重 875 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比的智慧与创造力。

食器中重要的还有簋(guǐ 鬼)、鬲(lì 利)、甗(yǎn 演)和豆等。簋是盛黍稷饭食的器具,也是重要的礼器,常与鼎配合使用。商代中期已经有了铜簋,其形状略似今天的大碗,一般是圆腹,下有圈足,但有的腹部有两耳。鬲,是煮饭或盛饭的食器,圆腹,其特点是三足中空,受火面积大,易于炊煮,商代中期亦已出现。甗是蒸食用的食器,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上部为甑(zèng 赠),底部有铜或木箅(bì 毕),用以盛饭。1976 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由三件甑和一件长方形鬲组成的三联甗,高 68 厘米,长 103.7 厘米,形体巨大,十分罕见。豆,主要用以盛肉酱等食物,上有圆盘,下为高柄,商代铜豆数量较少。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时仪狄或杜康作酒。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

明了酒,已经出现了陶质酒器。古代文献又记载,商人酗酒,到了商纣王时,甚至于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考古发现,商代墓葬中普遍用酒器随葬;在河北藁城台西发现了商代的酿酒作坊遗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商代的青铜酒器十分发达。主要有饮酒器爵(jué 决)、角、斚(jiǎ 甲)、觚(gū 孤)、觶(zhì 至)、觥(gōng 公)及盛酒器尊、卣(yǒu 友)、甗(bù 部)、罍(léi 雷)、方彝(yí 夷)和壶等(图5)。爵,形状似麻雀,一般为圆腹,前有出酒的流,后有尾,口沿上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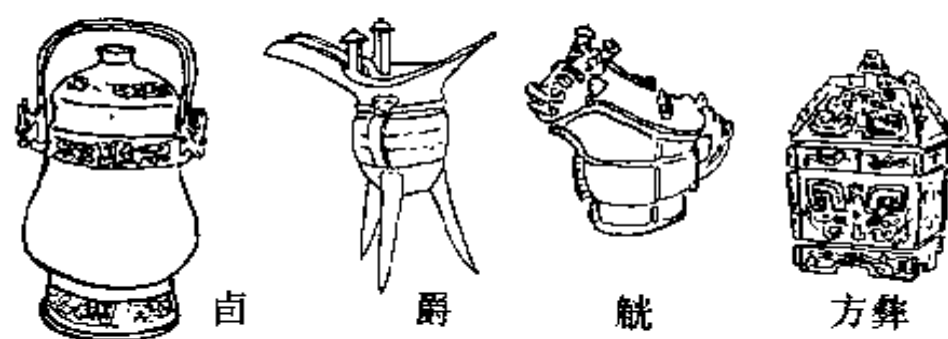


图5 商代青铜酒器

近流处又有两个小柱,腹侧有手执之鋮(pàn 盼),腹下有三个扁足。有的为单柱,或方腹四足。在商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铜爵。角,形状似爵,前后皆为尾而无流、无

柱。罍，形状亦似爵而个大，圆口，有二柱，而无流及尾。也有的为方腹四足。觚，圆腹，高体，侈口，高圈足，呈喇叭形。也有方腹的。觶，形状像今天的小瓶，商代晚期开始出现。觥，椭圆形或长方形腹，前有流，后有鋤，下有圈足，腹上有盖，是饮酒器中最大的，而且制作精致，纹饰繁缛。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龙纹觥，器身呈牛角状，下有圈足，上有盖。觥首作昂起的龙头形，双角突出，牙齿外露，器腹饰鼉（tuó 驼，扬子鳄）纹及龙纹，构思奇异。高18.8厘米，长24.1厘米。尊是重要的盛酒器，多为圆腹，大侈口，下有圈足。也有方腹的。另有一类尊，整体作成鸟兽形，有鸛（xiāo 消）、象、牛、羊等，称为鸟兽尊。传山东梁山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小臣兪犀尊，作站立的双角犀形，高24.5厘米，造型十分生动传神，背上有盖（已佚）。卣，也是重要的盛酒器，常与尊配合成组来使用。其形状是椭圆形腹，下有圈足，其特点是有提梁。也有整体作成鸟兽形的，例如传湖南安化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食人卣，做成一只踞坐的老虎形，张开大口，两只前爪正抱持一人，作欲吞食之

状，令人望而生畏。顶部有盖，上部有一个提梁，以便提携。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虎纹和龙纹等。高 32.5 厘米。甗，形状象今天的坛子，圆腹较矮，下有圈足。商代中期已经出现。鬯，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其特点是腹下部有一个可以穿系、用以倾酒的鼻钮。方彝，其形状是方腹、有盖。1976 年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偶方彝，形似两件方彝联在一起，长方体，盖呈四阿式屋顶状，上有两钮，器口作成伸出的梁头状，腹侧有两个附耳，底有圈足。通身饰兽面纹及鸟纹等。腹内底有铭文“妇好”二字。高 60 厘米，长 88.2 厘米。壶，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多为扁圆腹，腹上部两侧有贯耳。

由于奴隶主贵族在行礼时必须洗手，以表示洁净虔诚，所以在青铜礼器中还有水器一类，商代主要有盥（hé 河）与盘。盥是盛水以浇手的器具，形状似今天的茶壶，多为圆腹，前有管状流，后有鋬，下有三足。商代中期又有流在顶部、腹下为三个袋足的。商代晚期也有方腹的。盘，用以承接洗手之水。多为浅圆腹，高圈足。盘底多饰龙

纹、龟纹和鱼纹。

奴隶主贵族在行礼时，一般要奏乐来配合，以便使礼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显得文质彬彬，所以广义的礼器中还有乐器一类。商代的青铜乐器主要是铙（náo 挠）、铃和鼓。铙，是一种敲击乐器，使用时口朝上，执柄而击。安阳殷墟出土者个个小，三个或五个一组。南方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出土者，形体巨大，要竖立在木柱上来使用。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的商代晚期大铜铙，高103.5厘米，重达221.5公斤。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乐器，1962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铃，顶部有小钮，侧面有单翼，高9.4厘米。鼓，一般为木质，安阳殷墟大墓中曾发现蟒皮面木鼓的遗痕。铜鼓形制仿木鼓，发现很少。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一件商代晚期横置式铜鼓，鼓面铸出类似鳄鱼皮的纹饰，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2厘米。

由于青铜礼器意义重大，因而制作工艺考究，不仅造型凝重，而且表面还饰有繁缛的纹饰。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大多以很细的云雷纹作为地纹，再

在上面施以凸出于器表的兽面纹、夔纹、龙纹、凤鸟纹、蝉纹等主题纹饰。这些纹饰的母题大多是神话传说中的神秘动物，与器形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庄严静穆乃至森严可怖的气氛，从而更加强了青铜礼器的社会功能。其中兽面纹〔或称饕(tāo 滔)饕(tiè 铁)纹〕最为常见(图6)。古代文献记载，饕饕是一种凶兽，“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吕氏春秋·先识览》)



图6 商代青铜器兽面纹

其特点是突出表现头部，许多没有身躯；而有身躯的，则将身躯对称地展开于头部两侧。尤其是双目很大，又突出于面部之上，

巨睛凝视，令人望而生畏。

由于青铜礼器用于祭告祖先等重大典礼，所以从商代开始在青铜礼器上铸上文字，一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又称为金文。商代铭文比较简短，大多是标明礼器所有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在宗庙中的称号

(庙号),例如:“𠂤(子)父乙”,即表示这是子族祭祀父乙时的用器。到了商代末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例如前述的小臣兪犀尊,内底有铭文27字:“丁子(巳),王省夔卣,王易(赐)小臣兪夔贝。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十祀又五,彤日。”铭文大意是,丁巳那天,商王巡视夔地,用夔地的贝赏赐给小臣兪。这是在商王(帝乙)十五年征伐人(夷)方举行绎祭的时候。铭文所记帝乙(纣之父)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可与甲骨文的有关卜辞联系起来,为研究商人与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3 原始瓷器的出现

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已有了广泛的应用,并有了高度的发展。到了商代,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各类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陶业也不例外。正是在制陶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原始瓷器,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原始瓷尊,侈口,欹颈,折肩,圜底,肩部和腹部拍印细

方格纹。高 11.5 厘米,口径 10.3 厘米。胎呈青灰色,经化验是用高岭土制成,上施一薄层淡黄绿色釉。烧成温度在 1200℃ 左右,已基本烧结,质地硬,吸水性弱,说明早



图 7 商代白陶豆

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就已经发明了瓷器,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刻纹白陶,也是用高岭土作胎,烧成温度在 1000℃ 以上,器形与花纹都是模仿青铜器。例如郑州出土的刻纹白陶豆(图 7),大口浅盘,矮粗柄,盘腹刻饰云雷纹,柄刻饰圆涡纹。高 13 厘米,口径 22.5 厘米,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

4 精美的玉石器

在商代,虽然青铜工具已经广泛使用,但是石器(石铲、石镰、石斧等)在生产中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此外,安阳武官村大

墓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纹石磬（qīng 庆），十分精美。磬是中国古代重要乐器之一。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并有一定发展的玉器，到了商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精美的玉器也是商周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玉料基本上是新疆和阗玉。大部分是青玉，以绿色为主，还有少量的白玉和青白玉，均属透闪石、阳起石软玉。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就出土了玉器 755 件，主要有圭、琮、璧、璜、玦、瑗、环等礼器，钺、戈、矛、戚、大刀等仪仗用品，笄、柄形器及各种佩饰等。其中尤以各种圆雕或平雕的人物以及虎、象、熊、龙、鸮、鹰等动物形象生动，线条流畅，表明琢玉技术与抛光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一件站立的双面玉人，淡灰黄色，高 12.5 厘米，宽 4.4 厘米，厚 1 厘米。裸体，头上有双角，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

5 雕花木漆器及牙器

漆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漆器。商代由于青铜工具的广泛使用，使木

器和漆器的制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雕刻出精美的花纹。但是木、漆器易朽,不易保存,发现很少。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及安阳殷墟奴隶主贵族墓葬中都发现了雕花木椁板的痕迹。在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漆器。在藁城台西遗址出土了商代晚期的漆盘、盒残片,薄板木胎上雕刻有兽面纹、夔纹及云雷纹等,上漆朱红地黑花,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绿松石。在安阳殷墟还出土了商代晚期的漆豆、漆盂等,上饰兽面纹与圆涡纹等,有的漆器上还镶嵌有蚌壳、蚌泡及玉石等。

锋利的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商代的牙雕工艺也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件象牙杯,系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其中一对夔盃杯,高 30.5 厘米,杯身细高似觚,通身雕刻兽面纹等,并嵌以绿松石。另一件是带流的虎盃杯,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6 规模巨大的城市

城市是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早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城市,到了商代,更由于青铜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土木工程有了很大发展,使城市规模扩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商代的城市遗址,尤其是都城遗址,建国以来考古工作中已有重大发现。1983年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发现了商汤的都城西亳(bó 博)遗址。城址南邻洛河,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最长达1710米,东西最宽达1240米,总面积约为190万平方米。城墙用土夯筑而成,厚17—19米,残高1—2米。已发现北城门一座,东、西城门各三座,城内有几条纵横交错的干道。在城内南部发现三座方形的小城。居中的1号小城,每面长约200米,夯土围墙厚约2米,南面有一座大门。小城内为数组封闭式的建筑。现以位于城内中部偏东的4号建筑为例,东西长约51米,南北宽约32米。北部为正殿,坐北朝南,建于长方形夯土台基之上,东西长36.5米,南北宽11.8米,南部有四个台阶。其东、西、南三面为廊庑围绕,中间为庭院。南部廊庑中部偏东为大门,门道宽2.1—2.4米,西面廊庑北部还有一个宽约

1 米的侧门。此外,在尸乡沟西南约 6 公里的二里头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宗庙遗址以及大型贵族墓葬。

1955 年在河南郑州发现了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囿(áo 熬,又作囿)都遗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垣周长 6960 米,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城墙系用土夯筑而成,墙基最宽处达 32 米,地面上残留最高处达 5 米。城内东北部为宫殿区,发现了许多夯土基址,最大的有 2000 余平方米,上面残存有柱穴和柱础石。在城内外还发现多处铸铜、制陶、制作骨器的作坊遗址及墓地等。例如在南关外发现的铸铜遗址,面积达 1050 平方米,出土了熔铜坩锅残片及千余块陶范,其中以饕范和觥范为最多,说明当时青铜生产工具的制造是大量的。1974 年在张寨前街出土的青铜大方鼎高达 1 米,重 86.4 公斤。此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及山西垣曲古城也发现了商代的地方方国的城址,并出土了青铜器等。

根据文献记载,商代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后,直至商代灭亡,273 年没有再迁都。考古工作者从 1928 年

起在安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证实在今天安阳西北以小屯村为中心的面积达 24 平方公里的地区就是殷墟之所在。在这里已发现了数十座成组的宗庙宫殿建筑基址与商王的陵墓。宗庙宫殿建筑基址在小屯村,均建于夯土台基之上,平面有长方形、近正方形及凹字形等,规模巨大。例如乙组 8 号基址,南北长约 85 米,东西宽约 14.5 米。并且在基址上下及其附近发现了一些举行奠基、置础、安门等仪式而杀人杀牲的葬坑。又如在乙组 7 号基址前(南)面发现了宗庙建成以后举行祭祀典礼时杀人或埋车马的成排的葬坑,其中人牲即达数百人之多,充分反映了奴隶制的野蛮和残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宗庙建筑基址上不仅发现了巨大的石柱础,而且在石柱础上发现了放置的铜础(zhì 质)。例如在甲组 11 号基址就发现了 11 个檐柱的铜础,呈扁圆形,直径约 15 厘米,厚约 3 厘米,上面微凸,下面微凹,容易放平。铜础有隔潮作用,利于保护木柱。铜础的使用,也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业的发达。

与商王的宗庙宫殿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广大平民和奴隶居住的大多是简陋的半地穴式房屋,即先向地面下挖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坑,一般面积约 10 平方米左右。就以坑壁为墙,周围或有台阶可以上下,室内有灶坑,上面用茅草作屋顶。狭小潮湿,仅能容身而已。

7 随葬有大批青铜器的奴隶 主贵族墓葬

中国古代的青铜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贵族生前拚命压迫剥削奴隶,而且还要让奴隶为他们修建巨大的坟墓,随葬大批青铜器供他们死后享用。

商代晚期诸王的陵墓分布在安阳小屯村西北的侯家庄一带,已发现 13 座大墓。墓室平面呈亚字形或长方形,有四条、二条或一条墓道。规模巨大,例如 1001 号大墓,墓口呈亚字形,南北长 18.9 米,东西宽 13.75 米,墓室深 10.5 米。在墓室中用木板建成高约 3 米的亚字形椁室,中置木棺。在墓室的东西南北有四条墓道,墓室加墓道总面积达 712.75 平方米。在王陵中均发现有大量的殉葬人。以 1950 年发掘的安阳

武官村大墓为例,在墓室中发现有殉人 45 个,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侍从和姬妾;在墓室上部的填土中还发现人头骨 34 个,可能是埋祭时被杀的人牲。王室贵族墓葬中都随葬有大量的物品,以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的墓葬为例,共随葬有青铜器 460 余件、玉器 755 件、骨器和牙器 560 余件以及陶器、蚌器等,共计 1928 件,此外还有海贝 6800 余枚及海螺两枚。青铜器中有礼器 210 件,其中有方鼎 5 件、圆鼎 26 件、鬲 10 件、簋 5 件、方彝 5 件、尊 10 件、卣 2 件、壶 4 件、方罍 2 件、爵 40 件、斚 12 件、觚 53 件、觶 2 件、觥 8 件、盃 6 件、盘 2 件及编铙一组 5 件等。圆鼎中 2 件成对的有 3 套,6 件成组的有 2 套。从总体来看,以酒器为最多。在酒器中又以饮酒器爵和觚为最多,合计为 93 件,占全部礼器的 44.6%。这有力地说明商代礼器以酒器为主,这也是商人酗酒的具体物证。

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商王陵区内还发现了大规模的祭祀场,南北宽约 250 米,东西长约 450 米,历年来共发掘祭祀坑 1400 余座,估计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祭祀

坑因为排列整齐，又称为排葬坑。大多数坑中埋人牲，少数埋马、狗或车子等。埋人牲的坑多为长方形，一般长约2米、宽约1米，大多排放着10个人。坑内所埋人牲有全躯的，也有的是无首躯体。另有一种方形坑，长宽皆为1.5米，是专埋人头的。据研究，这里是商王祭祀祖先的场所，所用人牲大部分是青壮年战俘，其中最多的是羌人，一次祭祀最多时要杀三四百人。累累白骨鲜明地反映了商代奴隶制的野蛮和残酷，奴隶主贵族对社会劳动力恣意地进行杀戮摧残，这也是商代奴隶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证明。

在以安阳孝民屯为中心的殷墟西区发掘了商代晚期平民及中小奴隶主贵族的墓地，共发掘了939座墓葬。大多是小墓，长约2米，宽不到1米，埋葬着1人，有木棺及随葬品。此外还有少数较大的墓，并有少量殉葬人。这些墓葬排列有序，可以分为8个墓区，每区之中又可以分为若干组群。各区的墓葬不仅在随葬品的种类方面有所差别，例如有的区多用陶鬲随葬，而有的区陶鬲则很少。而且在随葬的青铜器上分别铸

有不同族氏的铭文。这说明各个墓区分别属于不同的族氏。这种商人“族墓地”的发现,反映商人生前是聚族而居,死后同族合葬在一起,说明在商代血缘关系、宗族纽带还是十分强烈的,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至于奴隶则是无所谓墓葬的,他们生前像牛马一样被奴隶主奴役,而最后或被当作殉葬人,或被作为人牲杀死,或死后被随意抛置。除上述在墓葬中发现的殉葬人或被杀祭的人牲以外,在考古工作中经常发现的被弃置于垃圾坑中的、甚至是被肢解了的人骨,正是奴隶悲惨命运的写照。

8 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商代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几百年之久,此时的中国文字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商代的文字可以甲骨文作为典型代表(图8)。甲骨文是189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被发现的,迄今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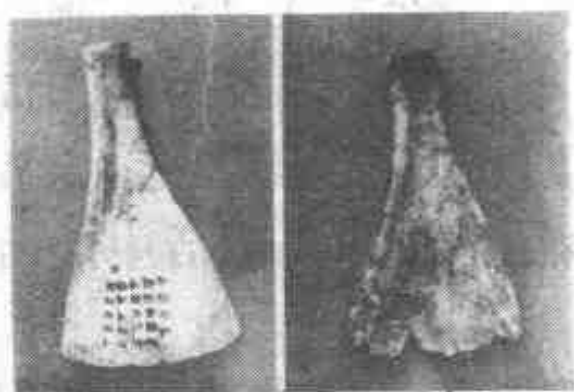


图8 商代牛卜骨

经出土了十余万片。甲骨文主要是商代晚期占卜以后刻在乌龟腹甲、背甲以及牛的肩胛骨等

上面的文字，也有少量记事刻辞。甲骨文的单字约有 4500 字左右，目前已经认识的还不到三分之一。甲骨文中不仅已经有了象形、会意、指事等文字，而且形声字已占了不小的比重，说明甲骨文是已经基本发展成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关于农业生产的协田（集体耕作）、受年（祈求丰年）等的记载，有关于日食、月食等天文历象的记录，有关于征伐土方、人方等的记载，有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有商王祭祀时杀伐人牲的记载等等，为我们今天对商代历史进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必须指出的是，甲骨文的出现也与青铜工具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1952 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二里岗发

现了商代中期的铜钻，呈菱形柱状，下端为圆弧形刃，长5.5厘米，刃宽0.8厘米，与同出的牛卜骨的圆钻孔正好相合，说明这是用于钻凿卜骨的工具。

除了甲骨文以外，前面已经谈到，在商代青铜器上也铸有文字，我们称之为铜器铭文，简称金文，其基本结构与甲骨文是一致的。到了商代末期有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长达50字的记事性铭文，同样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在玉器、石器和陶器上也发现了少量的文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陶器或石器等上面曾发现墨书或朱书的文字，而且笔锋清晰，这是当时已经使用毛笔书写的有力证明。

三 西周的青铜文化

商代末年居住在渭水流域的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商代最后一个王——纣十分荒淫暴虐,引起广大平民和奴隶的强烈不满,纣又连年征伐东夷,首都空虚。公元前1045年2月周武王乘机率领庸、蜀、羌、鬲、微、卢、彭、濮等国进攻商纣,甲子日两军在牧野对阵,商军“前徒倒戈”,纣王兵败自焚而死,周武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周朝。自周武王建国至周幽王灭亡(公元前1045—前771年)因为其首都在镐(hào 号)京(今陕西长安)等地,史称西周。

周朝建立以后,除对反叛的商人旧部及东方与国等进行征伐以外,还大规模地分封同姓及异姓诸侯,如封周公于鲁、封召公于燕、封康叔于卫、封太公于齐等,建立了较商代版图更为广大的国家。并“制礼作乐”,加强宗法等级制度。使西周的统治得到迅速的巩固,奴隶制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西周中晚期时,形成了列鼎制度。此时青铜酒器大为减少,新出现了簠(fǔ 府)、盥(xǔ 许)、匱(yí 夷)及钟等青铜礼器。青铜器铭文有了高度发展,长篇铭文大量出现,为巩固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大造舆论。并且,青铜礼器的器形和纹饰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质朴粗放的新的风格面貌。此外,青铜武器与车马器也有了新的发展。丝织业与建筑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精神文化方面,1949年以后新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

1 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

西周时期的青铜冶铸业较商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北窑发掘的西周初、中期的铸铜遗址,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有用块状土坯砌成的大型熔铜竖炉,直径已达1.6米—1.7米。还发现有陶质鼓风嘴,可能此时已用皮制的橐进行鼓风。经过对炉壁熔点进行测定分析,炉温可达1200—1250℃。

在青铜冶铸业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

西周的青铜器,尤其是礼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礼器的种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来说,西周初期,周王鉴于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曾严厉禁酒。如《尚书·酒诰》所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因此,青铜酒器的种类与数量大大减少,尤其是饮酒器爵、角、斚、觚、觶及盛酒器尊、卣、方彝等大为减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已很少见。此时青铜礼器以鼎最为重要,而且在西周中晚期形成了列鼎制度,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列鼎就是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形制和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的、成组的奇数的鼎。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汉代人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规定,如《仪礼·聘礼》等所记,九鼎的第一个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为羊、豕、鱼、腊(干肉)、肠胃、肤、鲜鱼和鲜腊。七鼎所盛是去掉末尾的鲜鱼和鲜腊。五鼎,其第一鼎盛羊,称为少牢,以下依次为豕、鱼、腊、肠胃(或肤)。三鼎所盛为豕、鱼、腊或

羊、豕、鱼。据《仪礼·士冠礼》所记，一鼎盛豚，为士一级所用。并且，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奇数的鼎还要用偶数的簋来配合使用。即九鼎用八簋相配，七鼎用六簋相配，五鼎用四簋相配，三鼎用二簋相配。这种列鼎制度一直沿用至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礼制的最突出的代表。此外，在西周中晚期还出现了新的盛稻粱的青铜食器簠和簋。簠，长方体，其特点是盖与器的形状和大小相同，并且都有双耳。簋，体为长方形圆角，双耳，圈足或四足，有盖，使用时间不长。再有，西周中晚期又出现了新的水器匜，形状似觥，椭圆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四足，用来代替盥，与盘配合使用。

在西周时期，青铜乐器有了飞跃的发展。西周中期开始出现了钟，这是西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与音乐有了一定高度发展的产物。钟是悬挂敲击的乐器，是中国古代金石之乐的主体。从形制上来说，钟顶上有圆柱状甬的称为甬钟，钟顶有半环形钮的称为钮钟，钟顶为扁平兽形钮、下端为平口的称为镈(bó 博)。单独一个悬挂使用的称为

特钟，大小相次、成组悬挂使用的称为编钟。例如 1954 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中期长亩墓出土了三件一组的编钟，1960 年扶风齐家村出土的西周晚期柞钟为八件一组。一般每个钟可以发出两个乐音，鼓部正中发一个音，右鼓部又发一个音，低于中部的音 2—3 度。钟出现以后，“钟鸣鼎食”就成了奴隶主贵族奢侈生活的写照。

西周初期，青铜礼器的形制、纹饰基本上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到了西周中晚期，发展形成了周人青铜礼器的特有风格。从造型上看，稳重谨严。例如鼎多为蹄足，簋多为带盖、欽口、矮扁腹、圈足下面附有三个短足。纹饰上变化更大，一改商代晚期神秘繁缛的风格，变为质朴粗放，通体装饰花纹以及主纹突出于地纹之上者已很少见，纹饰的母题不再是神秘的兽面纹与夔纹等，而是由粗宽带组成的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与鳞纹等，而且一般没有地纹。虽然这些纹饰是由神秘的动物纹发展而来，但神秘的意味已大为减弱。

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最大变化是铭文有了高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

的鼎盛时期，长篇铭文大量出现。究其原因，是因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为了巩固统治，就必须大造舆论，必须借助于礼器上的铭文来宣扬周王的善德天命、文治武功以及臣下所受到的恩宠与封赏，并传之久远“子子孙孙永宝用”，作为其世官世禄的凭证与护身符。

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十分丰富而广泛，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分封、赏赐土地及奴隶、奴隶的买卖与交换、周王对臣下的锡命典礼及对臣下的训诰、周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征伐、法律判决书等等，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下面分别举例予以简介。

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例如 1976 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西周武王时期的利簋，高 28 厘米，口径 22 厘米。腹内底有铭文 32 字：“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锡（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在甲子那天岁星当头的早晨灭亡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阑地，赏赐给官员利铜，用来作祭祀祖先檀公的宝器。其重要意义在于

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及《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中关于武王灭商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我国学者进一步结合天文学进行研究,确定了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5年3月27日,解决了中国古代历史纪年上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①

又如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腹内底有铭文122字。内容是记成王在一次祭典上对宗小子的训诰,其中讲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民。”即周武王在克商以后,就决定在洛阳营建成周,以统治全国。铭文又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了成周,并“迁宅于成周。”铭文所记与《逸周书·度邑篇》等文献记载相合,证实了西周初为巩固对东方的统治而营建成周并迁都于成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但对研究洛阳城市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西周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① 参见赵光贤《武王克商之年的管见》,《文史知识》1990年第8期。

再如 1976 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西周恭王时的墙盘,高 16.2 厘米,口径 47.3 厘米。腹内底有铭文 284 字,系统地叙述了西周从文王到恭王诸王的主要政绩,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例如其中谈到:“弘鲁昭王,广批楚荆,唯寔(贯)南行。”可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相互印证。

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的。例如 1986 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大墓出土的克盃,高 26.8 厘米,口径 14 厘米。盖内与器口沿内皆有铭文 43 字,大意是周成王对太保召公奭说,你对我很忠心,奉献食物给我,我命令克(召公奭的儿子)为燕侯(“令克侯于燕。”),派羌马及驭通知克巡视燕地,收纳燕地的土地及官员,克因此作祭器。铭文印证了《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记载,并确证琉璃河发现的古城为西周初燕国国都之所在。

又如 1954 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宜(或释俎)侯矢簋,高 15.7 厘米,口径 22.5 厘米。腹内底有铭文 120 余字,记载了康王将虞侯矢改封于宜,

并赐给矢土地和人民：“锡土：厥刚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又七姓，锡郑七伯，厥廬□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提供了周初分封的具体资料。

关于赏赐奴隶的。例如清代道光初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内壁有铭文291字，记载了康王二十三年赏赐给奴隶主贵族孟：“锡汝邦司（管家奴隶）四伯，人鬲（奴隶）自御（赶马的）至于庶人（种田的）六百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即一次共赏赐给孟1709名奴隶，数量之大是惊人的。

关于买卖奴隶之价格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关于古代奴隶买卖价格的记载，而西周中期的召鼎铭文却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唯一的资料。这就是：“我既赎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用百镒。”即五名奴隶价值为一匹马加一束丝，或值一百镒铜。说明在西周奴隶社会，奴隶还不如牛马值钱，奴隶的地位比牛马还要低下。

关于土地交易的。例如 1975 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恭王三年的卫盂，高 29 厘米，口径 20.2 厘米。盖内有铭文 132 字，其中有：“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裁（作价）八十朋，厥贮，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琥两、戔牟两、牟𩚑一，裁廿朋，其舍田三田。”即裘卫用价值贝币百朋的玉器和皮毛换取矩伯的十三块田地。但铭文下面又提到，这件事还要报告伯邑父等执政大臣同意，伯邑父等执政大臣还要派官员来参加受田。这说明西周初期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土地国有制，到了西周中期已经开始动摇，这是西周中晚期奴隶制开始没落的具体反映。

记叙周王对臣下册命典礼的。这种铭文数量很多，现以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颂簋为例。颂簋高 31.1 厘米，口径 24.4 厘米。其铭曰：“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弘佑颂入门立中庭，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贮廿家，监司新造贮用官御。锡汝玄衣黼纯、赤紱朱

衡、緼旗、攸勒，用事。’ 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返入瑾璋。……” 共计 152 字，详记册命典礼的时间、地点、受册命者与佑者、王命的内容，受命者还要返纳玉币等等，较古代文献诸如《左传·僖公廿八年》所记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典礼还要详尽。说明西周中晚期时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册命典礼制度，这对于研究西周的礼制及官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记载周王对臣下的训诰的。例如传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宣王时的毛公鼎，高 53.8 厘米，口径 47.9 厘米。器内壁共有铭文 497 字，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其内容记周王在锡命毛公时，对毛公的五次训诰。铭文谈到当时西周社会已是“𪚩𪚩四方，大纵不宁。”为了挽救周王室的危机，要求毛公率领下属官员，勤劳政事，不要沉湎于酒，不要侮辱鳏寡，辅弼王位。反复叮咛，忧心溢于言表。与《尚书·文侯之命》相似，而实较《尚书》为胜。

记载周王室对少数民族的征伐的。例如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的西

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高 40.8 厘米，口纵 86 厘米，横 137.3 厘米。内底有铭文 111 字（图 9）：“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趯趯子白，献馘（guó 国）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飧，王曰：‘伯父，孔颠有光。’



图 9 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

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寿无疆。”铭文记载周王命虢季子白征伐西北的少数民族玁狁（匈奴的前身），获得了胜利，周王在周庙予以赏赐和宴飧。全篇铭文有韵，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并且字体呈长方形，十分规整，笔道匀称，首尾如一，不露

锋芒,称为玉箸体,是西周晚期铭文书体的典型代表。

记载法律判决书的。例如 1975 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猭匭,高 20.5 厘米,流至鋈长 31.5 厘米。器与盖连铭,共计 157 字。铭文内容是记录一篇法律判决书。猭的下属牧牛因为与猭争五夫败诉,最初被判墨刑及鞭千,后来受到赦免,罚铜三百镒,鞭五百,并立誓今后不敢再扰乱猭。猭将此判决书铸在青铜礼器上,这是文献所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周礼·秋官·司约》)的具体例证。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法律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2 青铜武器的改进与青铜车马器的新发展

西周时期青铜武器有了新的改进,主要武器戈,在援的后端下部普遍出现了胡,胡上并有用以穿绳捆缚用的穿孔(称为穿),常见有短胡一穿戈和中胡二穿戈等。胡与穿的普遍出现,使铜戈能更牢固地捆缚于木秘之上,使杀伤力更加提高。另外又

出现了十字形戟，例如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大墓出土了“燕侯舞戈”铭文的十字形戟，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中也出土了“侯”铭文的十字形戟。

西周时期青铜车马器有了新的发展，新出现的青铜构件主要有车辖（xiá 狭）、轂（gǔ 谷）饰及鸾铃等。铜车辖一般呈长条形，上端大，下端小，用以代替商代的木辖，插入铜车𡔷的孔内，使铜𡔷更牢固地固定于木轴端。铜轂饰装在车轮两边的车轂上，一般由辖（guǎn 管）、𦨇、𦨇（dǐ 底）三部分组成，略呈喇叭形圆筒状，套在车轂上可以使车轮保持直立，防止内外倾斜。鸾铃，下部是一个梯形座，上部是一个扁圆形的铃，装在车子前面的木衡上或车𦨇的上方。其作用正如《韩诗内传》所记：“鸾在衡，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西周时期增加了上述铜车器，使西周时期的车子比商代更加坚固美观。新增加的青铜马饰主要有铜马冠，略呈扇面形，上饰兽面纹，周边有穿孔，用皮带系于马额之上。

3 丝织品的初步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缫丝和纺织丝绸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在浙江吴兴钱山漾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就曾发现过丝线、丝带和绢片等,经鉴定,是用家蚕丝织成,绢片系平纹组织。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蚕丝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出土了形态逼真的玉蚕,在一些青铜器上留下了当时丝织品的残痕,从发现的菱形花纹绮来看,当时已有了具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到了西周时期,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诗经》中有许多讴歌采桑养蚕的诗篇。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造型生动的玉蚕,大的长约4厘米,小的长约1厘米。在铜器上或淤土上又发现了许多丝织品的印痕,有的三四层叠压在一起。大多为平纹组织,也有山形纹图案的提花织物,也应是用提花织机织造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的刺绣印痕,花纹舒卷自

如,采用的是辫子股绣的针法,技法娴熟,针脚均匀整齐,其颜色是在绣后平涂上去的。

4 建筑技术的进步

文献记载周文王都于丰,在今陕西长安沣河西岸;武王都镐,在今长安沣河东岸。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沣河两岸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丰邑的中心地区在沣河中游偏北,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至西王村、冯村,东至沣河,西至灵沼河,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宫殿建筑基址,铸铜、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及贵族墓地。例如1983年——1985年在沣西马王村及客省庄发现的十几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4号建筑基址,平面为T字形,东西长61.5米,南北宽:西部最宽处为35.5米,东部残宽27.3米,总面积达1826.96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一座西周建筑基址。关于镐京,现已查明其中心地区在沣河东岸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和斗门镇一带,其中一部分被汉武帝

在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修昆明池破坏了，现存面积约有四平方公里。在洛水村也发现了一些大型建筑基址。

周人兴起于今陕西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的岐山以南的周原。1949 年以来在周原地区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宗庙宫殿建筑遗址。1976 年在岐山凤雏村发现的一组西周时期的宫室建筑基址，座北朝南，前后两进，全部座落于夯土高台基之上，南北全长 45.2 米，东西宽 32.5 米，面积约为 1500 平方米。南面正中是大门，门道宽 3 米，东、西两旁为房屋（东、西塾），大门外南边有影壁（屏）。进大门后是一个大的庭院（中庭），东西长 18.5 米，南北宽 12 米。庭院北面是一座殿堂（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建筑，面阔六间，长 17.2 米，进深三间，宽 6.1 米。主体建筑之后是一个小庭院，又被中间一条宽约 3 米的过廊分为东、西两个各 8 平方米见方的小庭院。后庭之北为最后的一座建筑（室），面阔五间，东西长 23 米，南北进深 3.1 米。在大门、主体建筑至最后面建筑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厢房，各有八间，进深 2.6 米，宽 4.2 米至 6.2 米。这样就由

大门、东西厢房及后室组成了略呈回字形的封闭式建筑,将主体殿堂包围于中心,布局规整严谨。房屋的墙壁用夯土筑成,一般厚0.58米到0.60米,地面及墙面均抹以由细砂、白灰和粘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平整而坚硬。

瓦的发明和使用是建筑用材和技术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根据考古发现,西周以前的房屋的屋顶全都用茅草覆盖,即文献所载的“茅茨土阶”(《吕氏春秋·恃君览》)。西周初期开始出现了瓦,最初数量少,可能仅用于覆盖屋脊。到了西周晚期,瓦已大量出现和使用。1976年在扶风召陈村西周晚期宫殿建筑基址上发现了大量的板瓦和筒瓦,有的筒瓦还带有半圆形瓦当。在瓦的背面或正面,出现用以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在长安沣河东岸洛水村发现的西周晚期的大板瓦,长约45厘米,宽约30厘米。这些都说明到了西周晚期屋顶已大部分用瓦覆盖,已能较好地解决屋顶的防雨问题。由于屋顶用瓦,使屋顶的重量大增,这就促使中国古代建筑的梁架结构及柱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扶风召陈村发现

的西周晚期的建筑基址的柱子加密、柱础加大及加固就是证明。

5 等级制度鲜明的墓葬

西周时期周王的陵墓到今尚未发现，诸侯一级的大墓已发现的有河南浚县辛村的卫侯及夫人墓、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辛村墓地规模很大，东西长约 500 米，南北宽约 300 米，已发现 8 座大型墓葬及 60 座中小型墓和 14 座车马坑。大型墓在东、西两边，中小型墓在中间，排列有序，可见西周时期诸侯的墓地仍是聚族而葬，据《周礼·春官·冢人》记载，这种墓地称为“公墓”。辛村大墓墓室略呈方形，长 6.3 米至 10.6 米，宽 5 米至 9 米，面积最大者达 95 平方米，有南、北两条墓道。墓室中央为椁室，底部铺硃砂，棺置于椁室之中。辛村大墓均已被盗，随葬的青铜礼器多已不存，例如一座西周初期的大墓仅残存青铜礼器鼎、簋、鬲、爵、尊与卣共 6 件，此外还残存一批车马器和武器。墓地的一座大型车马坑，长 10 米，宽 9.1 米，深 3 米，共埋 12 辆车、72 匹马及 8 只犬。1986 年在房山琉璃

河发掘了一座大型燕侯墓，墓室长方形，南北长 7.68 米，东西宽 5.25 米至 5.45 米，墓深 10.25 米，墓室四角有 4 条墓道。墓室正中为椁室，南北长 3 米，东西宽 1.8 米，高 1.58 米，用方木构成。墓已被盗，残存一些青铜礼器、武器及马器等，其中有前面介绍的克盃、克罍，说明这是燕侯之墓。墓中发现的铜矛，连同木秘长达 3.8 米至 4.2 米。漆盾的漆痕相当清楚，据漆痕可知漆盾有的呈长方形，高 1.3 米左右，宽 0.7 米左右。表面嵌有圆形、菱形或人面形铜泡饰，有的铜泡饰背面有“燕侯舞铎（yáng 阳）”铭文，直径为 10 厘米—18 厘米。

卿大夫的墓葬可以 1984 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的井叔墓地作为代表。井叔是周王的重臣，整个墓地的布局以几代井叔墓为中心，其它较小的墓在旁边，排列有序，主次分明，说明西周时期卿大夫也是实行族葬制。其中一座井叔墓，墓室为长方形，长 5.5 米，宽 4 米，深 8.24 米，南北有两条墓道。墓道内置木车及青铜车𦍋、辖等。墓室中部为椁室，长 3.95 米，宽 2.6 米，高 1.84 米，由方木垒成，椁顶上亦置有

青铜车马器。椁室内置重棺。墓已被盗，随葬品大部分已不存在，残存有石磬等。井叔墓东边其夫人墓虽已被盗，但残存井叔采钟两件及牺尊、爵、尊及卣盖等青铜礼器。

1974年至197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的西周中期的虢伯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簋、鬲、豆、甗、爵、觥、尊、卣、罍、编钟一组三件以及武器和车马器等。其中方鼎有三件、圆鼎有五件，可以作为西周时期小的诸侯国国君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等级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该墓还发现了以其妾同穴来殉葬。此外，此墓还附有车马坑。

1954年在陕西长安普渡村发掘的西周中期的长田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有鼎四件、簋两件以及鬲、甗、爵、觚、卣、罍、壶、盃、盘和编钟一组三件等。四件铜鼎中有三件形制相近，可能是盛肉用的列鼎，另一件不但形制有些区别，而且个体较大，可能是煮肉用的镬（huò 获）鼎。此墓没有发现车马坑，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士一级的奴隶主贵族。

在陕西岐山贺家村发掘了西周中期的一座一鼎墓，随葬有青铜鼎一件、簋一件以

及青铜武器戈、矛及车马器镢、銜等，这显然是最下层的士的墓葬。此墓也没有车马坑。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西周中晚期时奴隶主贵族的墓葬已形成鲜明的等级制度，在随葬青铜礼器上已形成列鼎制度。与列鼎制度相配合，诸侯、卿大夫的墓葬还随葬青铜乐器并附有车马坑，而士一级墓葬一般不随葬青铜乐器，也没有车马坑。这是西周中晚期礼制有了发展和加强的具体反映。

至于平民墓葬，只能用陶器鬲、簋（或盆）、豆、罐等随葬，都没有发现青铜礼器，这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的反映。

6 新中国建立以后新发现的 西周甲骨文

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宫殿基址的发掘工作中，在西厢房第二间的一个窖穴中发现龟甲和牛骨17000余片，其中大部分是龟甲，其中289片上面刻有卜辞，每片字数较少，最多的一片达30字。其

内容有祭祀商王文武帝乙的,有卜问商王田猎的,有的记有周王的重臣大保及毕公的,有记“伐蜀”及“楚子来告”的,有记易卦卦象的等等,为研究商末及周初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建国以后西周甲骨文在山西洪赵坊堆、陕西长安张家坡及北京昌平白浮等地亦有少量发现。西周甲骨文字体的特点是极小而纤细,表明契刻的技术十分熟练和高超。建国以前仅发现了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是建国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

四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西周最末一个王——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幽王十一年（公元前 771 年）申侯、吕侯、曾侯联合少数民族犬戎进攻镐京，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申侯等立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都城于洛邑（今河南洛阳），从此至秦统一中国（公元前 221 年）以前的时期，史称东周。东周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从公元前 770 年至前 476 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取名于孔子所著的史书《春秋》而称为春秋时期；从公元前 475 年（周元王元年）至前 222 年称为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兴起，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等相继称霸。此时，铁器开始逐步应用，随着各诸侯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方的青铜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各具风格

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到了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青铜工艺灿烂辉煌,分铸法有了高度发展,失蜡法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镶嵌金银及红铜等工艺有了很大发展。媵(yìng 映,随嫁)器铭文有了很大发展,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及水陆攻战纹出现。并且列国城市,尤其是各大诸侯国的都城有了很大的发展。

1 铁器开始逐步应用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商代已经发现了用陨铁加热锻打制作的铁刃铜钺,这是中国古代人民对铁的最初认识与利用。根据考古发现,到了西周末期和春秋初期,人工冶炼制造的铁器开始出现。例如 1990 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铜柄铁剑,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研究室鉴定,确认是人工冶铁制品,系用块炼法锻制而成。又如 1978 年在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初期墓葬中出土的铜柄铁剑,剑叶残长 9 厘米,亦为块炼法制成。块炼法是将铁矿石在约 1000°C 的较低的温度下,在固体状态下,用

木炭进行还原而得到铁的方法,需要再经锻打才能制作器物。到了春秋晚期,出现了用白口铸铁制作的铁器。例如 1976 年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铁鼎,残高 6.9 厘米,经鉴定为白口铸造生铁。白口铸铁是用铁矿石在 1146°C 的高温下、在液态状态下、用木炭进行还原得到的铁,一般含碳量在 2% 以上。白口铸铁的出现是与当时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分不开的,白口铸铁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能用来铸造各种铁器,使铁器开始能够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在推动生产发展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上述考古发现说明,中国使用生铁的时间比欧洲要早 1800 余年,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大贡献。此外,在长沙杨家山同墓中还出土了一柄铜格铁剑,残长 38.4 厘米。经金相鉴定,系含碳约 0.5% 的中碳钢,组织比较均匀,十分坚硬,可能经过高温退火处理,说明当时已产生了块炼渗碳钢。总之,春秋晚期铁器的开始逐步应用,尤其是坚硬的钢铁工具的出现,不仅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给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以

坚韧的工具,促使各种手工业、包括青铜冶铸业有了新的飞跃的发展。

2. 青铜工艺的灿烂辉煌

春秋时期,尤其是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冶铸业的规模和技术有了一次新的巨大发展。首先,青铜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湖北大冶铜绿山青铜矿冶遗址,已采用竖井与平巷等结合进行回采,每座冶铜炉日产铜 300 公斤以上。根据遗存的炼渣估计,这里曾冶炼出 8 万至 12 万吨铜。据此推论当时全国的铜产量当是十分巨大的。

其次,范铸法有了新的发展。1959 年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晋国铸铜遗址出土了陶模、陶范三万余块,其中配套的达百余件。通过研究发现此时陶模与陶范多系分制、组装而成,外范上的花纹也是采用一块单元花纹的陶模在外范上连续印制而成,这样不仅使产品规格化,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此时分铸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分铸法就是将器物的附件,例如耳、足、提梁等预先铸好,然后将其嵌入器身的

范中,然后再浇铸器身,使附件和器身铸合在一起。分铸法使器形复杂器物的铸造变得简单易行,因此能够生产出结构复杂、优美生动的艺术价值很高的器物。例如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壶身下面由两个立雕的伏兽承托,壶腹侧面有四个立雕的兽爬附,盖顶周围呈双层莲瓣形,中间站立一只仙鹤,作振翅欲飞之状。器身上又满饰相互蟠绕的龙纹,极其华丽而生动,是分铸法的典型代表作。再有,此时除分铸法之外,将附件焊接于器体之上的焊接术也有了普遍的发展。

第三,前面我们已经介绍,根据对河南浙川下寺出土的铜禁等的研究,说明在春秋晚期失蜡法铸造工艺业已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平。那么,这种工艺的出现理应在更早的时期,也可能在春秋初、中期时已经产生。并且,1978年在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尊盘,由尊与盘各一件组成。尊高30.1厘米,口径25厘米;盘高23.5厘米,口径58厘米。尊置于盘中。尊与盘的口沿上均有层次繁复的镂空蟠虺(huǐ 毁)纹附饰,亦系失蜡法铸造。这反映

到了战国时期,失蜡法铸造工艺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第四,由于春秋晚期坚硬的钢铁工具的出现,使青铜器表面加工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金银镶嵌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或刻出花纹,然后将金银丝或片嵌入,加以磨平。又称为金银错。这种工艺技术不仅用于花纹,而且也用于铭文,尤其在南方吴、越、楚、宋等国的武器上更为多见,也起到表面装饰的效果。其次为嵌红铜工艺,即将用红铜丝或片做成的花纹嵌在青铜器表面。以上这两种工艺都是利用不同金属的不同色泽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打破过去单一色彩的局限,而收到红黄白相间的绚丽的效果,显得十分富丽而华贵。再有,线刻工艺。春秋末期除了铸造的青铜器以外,又出现了用纯铜片槌打而成的薄胎青铜器,如铜匜、铜缶、铜鉴及铜杯等。往往在上面用钢刀刻出狩猎纹、宴乐纹和水陆攻战纹等,线条细如毫发,别开生面。

3 反映现实生活的宴乐、狩猎 和水陆攻战纹的出现

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中晚期,青铜器的纹饰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但商代以来的兽面纹等已很少见到,而且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窃曲纹等也很少见了,而是以蟠螭(chī 痴)纹和蟠虺纹为主了。螭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虺是小蛇,这两种纹饰就是分别由两条或多条的螭或虺互相蟠绕组成一个纹饰单位,然后做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布局。这与上述春秋时期冶铸工艺出现并盛行印模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即这两种纹饰都是分别用一个单元花纹的陶模在外范上连续印制而成的。这些纹饰已不再具有神秘的意义,而成为纯粹的图案性的装饰,这也是当时社会大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尤其重要的是,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出现了以人们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青铜器纹饰,这就是宴乐舞蹈、水陆攻战、狩猎、采桑等纹饰。例如 1965 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壶,高 40 厘米,口径 13.4 厘

米。壶身从上到下嵌错有四层纹饰。第一层左边是会射图象，表现贵族们正在张弓



图 10 战国宴乐、狩猎、功战纹铜壶纹饰展开图

布矢、射向布侯的情景,可能是古代乡射礼的写照。右边是采桑图象,表现贵族妇女正在采桑,有的爬到树上去采,有的在地上接应。这可能就是《礼记·月令》所载,“季春之月,……后妃齐戒,亲有乡躬桑”的写照。第二层左边是宴乐歌舞图象,在上面的殿堂之中,贵族们正在宴饮酬酢,仆侍奉酒献豆;下面则是舞女们正在钟鼓和石磬的伴奏下轻歌曼舞。总之,表现的是贵族们宴飨宾客的情景。右边则是弋射及会射图象。弋射表现的是人们跪在地上正弯弓向天上射鸟,而矢上皆有缴(zhuó 酌)线。第三层是水陆攻战图象。左边是陆战景象,上层是徒兵格斗,下层是登云梯攻城的情景。右边是水战场面,两舰相遇,下面士兵在奋力划桨,上面船头则是短兵相接正在酣斗。这无疑是当时兼并战争的真实写照。第四层是狩猎图象,猎人们正在用矛等来刺杀奔跑中的野兽(图 10)。总之,上述宴乐、狩猎、攻战纹的出现不但是古代青铜器纹饰发展上的一大变革,而且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纹饰已从幻想的神的世界走向现实的人的世界,艺术手

法也从图案式发展到有了场面和层次,出现了真正的绘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促使人们的社会意识与审美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的结果,它开启了汉代画像的先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4 滕器铭文的大量出现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兴起,因此,周王及其臣下所铸造的青铜器大为减少,而各国诸侯及卿大夫所制作的青铜器大为发展起来。此时,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长篇铭文大为减少,而且一般不再具有前述西周时期铭文的书史性质,而出现了大量的滕器铭文。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与兼并战争频繁,各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与力量,需要彼此结成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结盟一方面需要举行盟誓,一方面又要借助于婚姻。正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因此,此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联姻大为发展,促使青铜礼器中为陪嫁女儿

而制作的媵器大量增加,其中以盘、匜、鉴等为最多。并且还要在上面铸上加强两国政治友好的铭文,成为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点。

例如 1955 年安徽寿县出土的吴王光(夫差之父)鉴,高 35 厘米,口径 59 厘米,内底有铭文 53 字:“唯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吴王光择其吉金玄光白光,以作叔姬寺吁宗彝荐鉴,用享用荐,眉寿无疆。往矣!叔姬虔敬,乃后孙勿忘。”大意是,五月的时候,已经临近了出嫁的日子。在大吉的庚日,吴王光选择上好的铜和铅锡,制作了为三女儿寺吁陪嫁用的青铜鉴。并叮嘱寺吁说:去吧!要尊敬你的公婆,后世子孙不要忘记吴蔡两国的友好。铭文有韵,内容十分生动。

5 各地区青铜文化的大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铁工具的逐步应用,各诸侯国的兴起,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国的青铜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已经发现的有晋、齐、燕、秦、楚、吴、越、鲁、郑、宋、卫、蔡、曾、徐、江、黄、

郟、鄩、邓、许、陈、曹、滕、邾、薛、莒、邾、杞、纪、铸、虞、虢、苏、芮、郤、费、郕、戴、息、潘、胡、邳等 40 余国的青铜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各国的青铜器也有所区别。目前我们可以把春秋时期各国的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大致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即中原以晋国为代表的晋文化区、东方以齐国为代表的齐文化区、北方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区、西方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区、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区、东南以吴国和越国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区。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晋文化区 西周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后改称为晋。周平王东迁以后,晋国成为周王室的重要支柱,以后逐渐强大起来,至晋文公时大败楚军于城濮而成为霸主。晋文化区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地处中原,经济发达,在当时最为先进。前述在山西侯马发现的晋国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充分代表了晋文化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晋文化青铜器造型浑厚稳重,例如鼎多为深腹圆底、附耳、蹄足、浅圆形盖,多饰有蟠螭纹和蟠虺纹。

春秋中期以后，晋文化的青铜器铭文中兴起了一种艺术字体，笔划的特点是尖头、腹肥，形似蝌蚪，被称为蝌蚪文。它不仅起到记事的作用，而且具有美术装饰的作用。例如传出河南辉县的智君子鉴，高 22.2 厘米，口径 43.5 厘米，腹内铭 6 字：“智君子之弄鉴”。即为蝌蚪文。据研究，智君子即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大夫智瑶，公元前 453 年被韩、赵、魏所灭。

齐文化区 西周初，周武王封姜太公于齐，都于营丘。春秋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整顿行政、军队与赋税制度，使齐国强盛起来。并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一些国家打败北戎及狄人，兴师问楚罪于召陵，成为春秋时期最初的霸主。齐文化区主要包括今山东地区，其青铜器亦有特点，例如由簋发展而来的敦，春秋中期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河北易县出土的齐侯敦，高 17.5 厘米。敛颈深腹，腹旁有两个环形耳，圆盖上有四个半环形钮，自铭为“膳敦”，为齐侯嫁女于燕时所做的媵器。同出土的鼎为附耳平盖，这也是齐文化青铜器的特点。齐文化青铜

器铭文多作长方形，规矩整齐，笔划平直，为其特点。

燕文化区 燕国为北方大国，但春秋时期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书中关于燕国的记载很少。1972年至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中有关于燕、晋交战的记载，说明当时燕与中原还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因此，建国以来发现的春秋时期燕国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例如纹饰亦以蟠螭纹为主。但是由于燕国偏处北方，离成周较远，因此，保存西周以来传统特点较多，例如鼎足上部及鼎耳上端平折部分仍多饰以兽面纹。但是，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在春秋晚期燕国青铜器上的人事活动纹多为狩猎纹，而不见水陆攻战纹，而且又常见兽纹与鸟纹等，这可能与燕国的地域和内蒙古、东北地区毗邻，较多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

秦文化区 西周灭亡时，秦襄公出兵救周有功，周平王东迁时，将西周故地分封给秦，秦国逐步发展起来。至春秋中期，秦

穆公向西发展，“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但是由于秦僻处西方，因而发展较慢，其青铜器制作比较粗糙，但保存西周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例如秦国青铜器铭文直接继承西周时期的籀（zhòu 宙）书系统，形成一种规整的风格。这可以 1978 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和秦公傅以及 1923 年甘肃天水西南乡出土的秦公簠的铭文作为代表。此外，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的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 1974 年陕西户县宋村出土的春秋初期的青铜鼎，形制为浅腹，蹄足粗壮。

楚文化区 周成王时封楚子熊绎于丹阳，春秋初楚武王自立为王，至楚文王时始都于郢（yǐng 影），开始在江汉地区蓬勃发展起来。至春秋晚期，楚国兼并了江淮地区申、息、邓、唐、郢、罗、厉等四五十个小国，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并逐步形成了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楚文化青铜器有着鲜明的特点，例如青铜鼎多为细高足。尤其是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并流行鸟书。即将文字书写成鸟形或在笔划上下加上鸟形装

饰,成为一种美观的艺术字体。而且往往将鸟书铭文施于器物表面作为装饰,许多铭文并加以错金,显得十分华丽。

吴越文化区 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吴,周康王时封其后人周章于吴。春秋中期吴王寿梦时开始强大起来,春秋晚期在晋国的支持下,吴王阖闾率军攻破楚国的郢都,其子吴王夫差多次伐齐,公元前482年与晋定公争盟主于黄池。这时居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越王勾践乘机攻入吴都(今江苏苏州),并于公元前473年灭吴,此后越国成为东南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国。春秋时期以吴越为代表的吴越文化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首先,吴越的青铜武器在当时最为精良,以剑最为有名。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早已倍加称赞,而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证明文献所记绝非虚语。例如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长达55.6厘米,宽4.6厘米,剑身上有鸟书铭文二行八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铜质精良,剑身上饰有菱形暗纹,剑格上嵌有蓝玻璃及绿松石,虽然历经二千四五百年,至今仍光洁

如新、锋利异常。其次，吴越文化有自己特殊的青铜乐器钲等。钲，其形制类似商代的铜铙，口朝上，亦为执柄而击，主要用于军旅战争之中。

6 列国城市的兴起

春秋时期由于兼并战争频繁，以及各诸侯国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促使各诸侯国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现各国的都城大多从春秋时期开始修筑，至战国时期进一步建设，许多还沿用至汉代。下面择要予以介绍。

1954年至1960年在河南洛阳调查发掘了东周的王城遗址。位于洛河与涧河交汇之处，略呈方形，北墙长2890米，西墙南北两端相距3200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墙一般宽约10米，系用夯土版筑而成。北墙外还发现有深5米的护城壕。在城内南部发现两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其中北面的一处，东西长344米，南北宽182米，四周有围墙，内有长方形建筑基址，并发现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及兽面纹、卷云纹瓦当，可能是周王王宫之所在。在城内西北

部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这种城市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面朝后市”相符合。在城内的现今的中州路一带还发现了大批东周时期的墓葬。

从 1952 年起在山西侯马调查发掘了晋国晚期的都城新田遗址。位于今侯马市西北郊，汾河与浍河交会处，由平望、台神、白店、牛村等六座小城址组成。在牛村与平望古城内都发现有夯土台基，其中牛村城内北部正中的一处台基，呈正方形，每边长 52 米，高 6.5 米，周围散布有许多筒瓦及板瓦残片，可能是当时宫殿所在。在牛村古城南还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以及制陶、制骨器等作坊遗址，在浍河以南的上马村发现了大量的东周时期的墓葬。尤其重要的是，1965 年在古城址东南秦村附近发现了春秋晚期的盟誓遗址。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的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盟誓活动。将盟辞用朱书或墨书书写于玉石片上，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以取信于鬼神。侯马盟书共出土 5000 余片，

大多呈圭形，长 18 厘米至 32 厘米，宽 2 厘米至 4 厘米，每件少者 10 余字，多者达 200 余字。其内容大多是与盟人表示要效忠于盟主、一致诛讨已逃亡在外的敌对势力的宗盟类盟书。据研究，这批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可能就是晋国世卿赵鞅（赵简子），这批盟书就是晋定公十六年（公元前 496 年）赵鞅与其他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反对其政敌赵尼（穆）。侯马盟书印证了春秋晚期晋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 1964 年起在山东淄博调查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遗址。城址位于今临淄区的淄河西岸，由大、小相连的两座城址组成。小城系宫城，位于大城的西南角，略呈长方形，东墙长 2195 米，北墙长 1404 米，现已探明南门两座及东、西、北城门各一座以及三条街道。城内北部有大片夯土建筑基址，其中心建筑“桓公台”呈椭圆形，南北长 86 米，高达 14 米，是当时的宫殿所在。在小城内南部发现有铸铜及铸钱币的作坊遗址，可能是

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之所在。大城略呈长方形,东墙随淄河弯曲,长 5209 米,北墙长 3316 米。南北城墙外面有宽 25 米至 30 米、深约 3 米的护城壕。现已探明大城南北两面各有两座城门,东、西各有一座城门。大城内已探明有七条大道,多与城门相连,一般宽 10 余米至 20 米。在大城西部还发现了一条纵贯南北、全长 2800 余米、宽 30 米左右的排水渠道,其北端分为两支,分别注入北护城壕及城西的系水,在西北隅穿过城墙之处还发现有大石块砌成的内窄外宽的涵洞。大城是官吏与平民的居住区,城内东北部及中部等处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大城东北隅的河崖头发现一处春秋时期高、中级贵族的墓地,其中一座石椁大墓外围的殉马坑中,仅清理了一部分,即发现殉马多达 145 匹,数量之多甚为罕见。据《战国策·齐策》等文献记载,齐宣王时临淄有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大大超过了东周的王城。

从 1973 年起对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

的秦国都城雍城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雍城遗址位于今陕西凤翔城南、雍水之北，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 3200 米，东西宽约 3300 米。城墙残存最高处达 7.9 米。在城内中部偏北马家庄发现的 3 号大型建筑群遗址，长 326.5 米，宽 59.5 米至 86 米，四周有围墙，是一组五进院落、五门三朝的建筑，可能是秦公朝寝之所在。在北城墙南面偏东 300 米处，发现了“市”的遗址，平面长方形，东西长 180 米，南北宽 160 米，四周有夯土围墙。在城内还发现了一座可以藏冰 190 余立方米的“凌阴”（冰窖）遗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中部偏西处姚家岗出土了第三批共 64 件窖藏的青铜建筑构件（钲）。大多呈长方形筒状，有的作曲尺形，表面多饰有蟠螭纹。套在木质梁枋上，既起保护作用，又达到装饰效果。类似的青铜建筑构件在陕西临潼和咸阳等地也有发现，说明东周时期宫廷建筑中已广泛使用青铜建筑饰件。这些青铜建筑饰件，金光闪闪，可以起到彩绘所达不到的富丽效果。此外，在雍城遗址南面的三畴原上还发现了秦公陵园，其北为中小型墓葬区。

新中国建立以后,从 50 年代起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都郢城遗址不断地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城址位于湖北江陵城北 5 公里,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 4450 米,南北宽 3588 米,夯土城墙高出地面达 3.9 米至 7.6 米,底宽 30 米至 40 米。现已确定城门七处,其中有两座水门。现今朱河和龙桥河穿过城墙之处就是当年北墙东部及南墙西部的水门之所在。城内发现夯土台基 84 座,以中部偏东南处最为密集,最大的长达 130 米,是宫殿区之所在,周围还发现有宫墙遗迹。在城内还发现了 400 座以上的水井,并发现有陶井圈、竹井圈和木井圈。在城址周围三四十公里范围内发现了 25 处规模巨大的墓葬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郢都的繁荣。

7 诸侯国君墓葬的发现

春秋时期周王的陵墓尚未发现,但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墓葬,它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春秋时期青铜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水平。下面择要予以介绍。

从 1976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了陕西凤翔三畹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园。已发现 14 座双墓道大墓及两座单墓道大墓等。陵区的北部、西部和南部还发现了总长达 7000 余米的防卫壕沟。陵区中部偏北的一组墓葬规模最大，从南向北排列着两座双墓道大墓及一座单墓道大墓。最南面的一号墓规模最大，墓室呈长方形，长 59.4 米，宽 38.8 米，深 24 米，两端的墓道长达 270 米，总面积达 5330 余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春秋时期的墓葬。此墓已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金带钩及十余件铁铲、铁锛等。据研究可能是春秋晚期秦景公的墓葬。

1955 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发掘了春秋晚期蔡昭侯的墓葬。墓室为长方形，南北长 8.45 米，东西宽 7.1 米，深 3.35 米。墓中出土随葬品 584 件，其中青铜器 486 件。青铜礼器主要有饗鼎 1 件、升鼎 7 件、馈鼎 9 件及小鼎 1 件，簋 8 件、鬲 8 件、簠 4 件、敦 2 件、豆 2 件、笱 2 件、尊 3 件、壶 2 件、盃 1 件、尊缶 4 件、盥缶 2 件、鉴 4 件、盘 4 件、匱 1 件以及编钟 8 件、甬钟 12 件、钮钟

9件、钲1件及镈(chún 纯)于1件等。说明当时诸侯也用九鼎,为研究春秋时期的礼制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还出土有青铜戈、矛、剑等武器及𡗗、辖、镢、銜等青铜车马器以及玉器、漆器及金叶等。

1990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掘了春秋初期虢(guó 国)国国君的墓葬。墓室为长方形,长5.3米,宽3.55米,深11.45米。葬具为重棺单椁。出土随葬品3200余件,其中青铜器1700余件。主要有列鼎9件、簋8件及鬲、豆、盨、壶、盘、匜以及甬钟1套8件、钲1件等。此外还有铜柄铁剑等武器以及缀玉面罩、玉佩饰及金带饰等。在墓葬附近4米处发现了一座大型车马坑,长46米,宽5.2米。目前发掘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此外,1956年至1957年曾在这里发掘了虢国太子的墓葬。墓室亦为长方形,长5.8米,宽4.25米。葬具为单棺重椁。出土随葬品970件,其中青铜礼器主要有列鼎7件、簋6件、鬲6件以及甗、豆、壶、盘、盥和甬钟1件、钮钟1组9件以及武器、车马器等。其中1件铜戈的内上铸有“虢太子

之徒戈”6字铭文。在该墓西侧10米处还附葬有车马坑，坑底南北长29米，东西宽3.3米至3.5米，内部埋有10辆车、20匹马及3只狗。这一切均与虢太子的身份相合。

同时，在上村岭虢国墓地还发现了许多随葬5件、3件或1件铜鼎的中小贵族的墓葬。上述这些墓葬是研究春秋初期青铜礼器及礼制的珍贵资料。

五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前 222 年），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在生产中广泛应用，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此时，出现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称雄的局面。并且，各国通过变法，例如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最终确立了封建制度，奴隶制宣告结束。因此，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也已进入尾声。具体来讲，青铜礼器大为衰落，战国中晚期时虽然还有一些精美的礼器，例如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错金方罍及方鉴等，但大多数礼器已是素面，朴素无纹。并且，此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为刻铭，一般很简短，其内容多为制造年月、地点、督造官、工官及制造者的姓名，或是标明器物的重量与容积等，其性质为“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吕氏春秋·孟冬纪》）而已。

但是，此时的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发

展,青铜器的生产转向以日用品为主了。首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青铜货币与度量衡器迅速发展起来,广泛流通与使用。其次,铜镜、带钩、铜灯、玺印与符节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出现了镶玉嵌琉璃及漆绘等工艺高超、十分精美的产品。再有,虽然此时铁兵器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武器仍以青铜武器为主,并且由于兼并战争的频繁与激烈,青铜武器的数量激增,而且出现了杀伤力很强的木弩及其上的发射构件铜弩机。

战国晚期,各国之间经过了极其残酷而激烈的兼并战争,至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齐,最后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几百年的诸侯分裂割据状态,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一切也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的结束,秦汉以后虽然青铜货币与铜镜等仍在继续发展和使用,但铁器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已占居主导地位,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

1 铁工具的普遍使用

战国时期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铁的产量大增。在河南登封告成战国冶铁遗址发现的熔铁炉直径已达 1.44 米,炉壁及炉衬用白色石英砂掺和耐火土制成。出土的陶范以农具范为主,用经过淘洗的细泥掺细砂制成,经烘烤后,胎质坚硬,形制规整,扣合严密。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河北兴隆出土了一批 42 副 87 件战国时期铸造铁农具、工具及车器等用的铁质的内、外范,系用白口铸铁制成,并采用了防止变形的加强结构及金属芯,其设计和铸造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水平。使用铁范不仅可以使产品形状稳定,而且可以连续使用,使产品的产量大大提高。

战国时期冶铁术也有了新的发展。首先,在白口铸铁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将白口铸铁加以柔化生产韧性铸铁的技术,克服了白口铸铁性脆易断的缺点,更适于制作生产工具。例如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遗址出土的铁铲,据金相鉴定,就是用白口铸铁经过长时间的柔化处理制成的。其次,

经过对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器进行金相考察,说明当时已在块炼铁渗碳法制造高碳钢技术的基础上,又掌握了淬火技术。

在上述冶铁业和冶铁技术大发展的基础上,到了战国中晚期,铁器的数量和种类大增。考古工作中出土战国铁器的地点包括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区以及北方匈奴、东胡与南方百越等地区。而且出土数量很多,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一次就出土战国铁农具和工具 95 件之多。此时铁器的种类已包括农业生产工具 V 字形铁口犁、锸、耬、锄、铲等,手工业生产工具斧、铤、凿、锥、刀、削、锤等,武器剑、矛、戟、匕首、胄等,生活用具带钩以及铜鼎的铁足等。说明此时铁器已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其中又以农具与手工工具为大宗。

并且,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经代替铜工具而在生产工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工具占 65%。尤其是 V 字形铁口犁的出现,使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这

和过去的耜耕相比,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再有,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促使水利工程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的开凿等。这一切无疑地使农业生产有了飞速的进步。此外,铁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获得很大的提高,为封建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2 青铜乐器的高度成就

战国时期,虽然铁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但是青铜冶铸业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不仅产量仍然很大,而且技术水平仍在不断提高。最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铜编钟。这套铜编钟共计8组64件,外加一件楚王赠送的镈,共计65件。出土时完好地分三层悬挂在高达2.67米、总长为10.79米的平面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的编钟架上,并且同时出土了撞钟用的槌(xiū 休)漆彩绘长木棒两根及敲钟用的T字形的槌漆彩绘的木槌6个。钟架

的中下两层横梁由 6 个身上佩剑的青铜武士用头和双手承托。钟架最上一层悬挂 3 组钮钟共计 19 件,中间一层悬挂 3 组甬钟共计 33 件,下面一层悬挂 2 组甬钟 12 件加一件楚王铸。其中最大的一件编钟高 153.4 厘米,重 203.6 公斤;最小的一件编钟高 20.4 厘米,重 2.4 公斤。整套编钟重达 2500 公斤,十分惊人。每件编钟上面不仅铸有精细的花纹,而且还有大量的错金铭文。除正面钲部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外,其余鼓部等处皆为关于音乐的铭文。包括标明此钟的音阶名称和关于乐律的铭文,其中包括当时楚、晋、齐、周和曾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整套编钟铭文的总字数达 2800 余字,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经中国音乐研究所测试,每个钟均能发出两个乐音,而且和钟上的音阶铭文相符,至今音色优美。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和现在国际通用的 C 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音域宽广,包括五个八度,其中心音域 12 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至今可以演奏各种曲调。说明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

已经完全可以满足音响设计的要求。1979年这套编钟首次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时,曾为各国朋友演奏了“楚商”及“一路平安”等中外名曲,大家无不为中国古代人民在音乐及青铜铸造工艺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热烈鼓掌和表示钦佩。

3 青铜货币的大发展

根据考古发现,商代以海贝作为装饰品,同时,也作为货币来使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随葬有海贝 6800 余枚。商代还发现有用青铜、兽骨和蚌壳等仿海贝制成的铜贝、骨贝及蚌贝等。西周时期仍以海贝作为货币,并使用铜块等作为称量货币。春秋中晚期,随着奴隶制的没落,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此时开始出现了金属铸币。1959 年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春秋晚期用青铜铸造的仿照当时使用的铜铲的形状铸造的货币,高约 12 厘米,耸肩尖足,柄部中空,称为空首布。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促使青铜货币有了空前的发展,广泛地流通与使用。由

于各诸侯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当时各国所使用的青铜货币的形状也各有不同,主要有布币、刀币、圜钱及铜贝四种(图11)。韩、赵、魏主要使用布币,其特点,柄部已不再是中空的,而与铲身同为扁平状,称为平首布。魏国的布币大多是平肩或圆肩,方足,圆跨。币面上有的铸有地名,如“安邑”、“蒲阪”、“阴晋”、“共”等。有的币面铸有币值铭文,如“梁奇(或释充)铢,百当铢”、“梁正布(或释尚),百当铢。”据测定,1铢约为12克至13克。赵国的布币多为圆肩、尖足或圆足,币面有的也铸有地名,如“晋阳”、“兹氏”、“榆即(次)”、“蔺”等。此外赵国布币还有的上面有三个圆孔,称为三孔布。韩国的布币大



图11 战国货币

布币。”据测定,1铢约为12克至13克。赵国的布币多为圆肩、尖足或圆足,币面有的也铸有地名,如“晋阳”、“兹氏”、“榆即(次)”、“蔺”等。此外赵国布币还有的上面有三个圆孔,称为三孔布。韩国的布币大

多为小型方肩、方足、方跨布。

齐与燕主要使用刀币，因其形状仿自刀削，故称刀币。齐国的刀币较大，上面铸有铭文，常见的有“齐大（旧释法）化（货）”、“齐之大化”、“齐返（或释造）邦长大化”、“节墨之大化”等。燕国刀币较小，其刀背有弧形与磬折两种，上面多铸有铭文“易（旧释明）”字。

秦国主要使用圜钱，圆形，无廓，中为方孔，上面铸有铭文“半两”，又称半两钱。

楚国使用铜贝币，上面铸有铭文，常见的有“𠄎（xùn 逊）”、“𠄎”等。楚国同时使用黄金铸币，在方形或圆形的金钣上，凿印有正方形或圆形小印，常见的有“郢称（旧释爰）”、“陈称”。

必须指出的是，到了战国晚期，除楚国以外，各国大多已制造并流通圜钱。就是这样的基础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用秦半两钱统一了全国的货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4 青铜度量衡器的出现

度量衡器是测量长度、容积或重量的器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代已经出现了骨尺和牙尺,经实测,1尺约为15.78厘米至16.95厘米。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实物租税逐步代替劳役地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精确耐用的青铜度量衡器出现了。传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尺,扁平长条形,长23.1厘米,一侧刻10寸。

战国铜量器最著名的是秦国商鞅变法时制作的标准量器方升。长方形,一端有柄,器身左侧刻铭文32字:“(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经计算,1升为202.15毫升。底部后来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就是以商鞅方升作为标准的。此外,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了三件战国时期齐国的铜量器: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铤。经实

测，子禾子釜容积为 20460 毫升，推知 1 升为 204.6 毫升。子禾子釜上还刻有铭文 90 余字，规定了量器的管理制度和对违反者的处罚。

战国铜衡器有铜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环形权。例如 1954 年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楚国天平与铜环权。天平为木杆（衡），长 27 厘米，两端系有小铜盘，直径 4 厘米。铜环权一套共计 9 枚，分别为半斤、4 两、2 两、1 两、12 铢、6 铢、3 铢、2 铢、1 铢。根据半斤权重 125 克推算，楚国当时 1 斤重为 250 克。一种是半球形权，顶端有鼻钮。例如 1964 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的高奴权，上面有铭文 16 字：“三年漆工配，丞训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高 17.2 厘米，底径 23.6 厘米，重 30750 克。据此推知 1 斤约合 256.3 克。

5 铜镜、带钩与铜灯的普遍应用

在古代，最初人们是用陶盆盛水以鉴容，因此盆又称为鉴。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开始用青铜来制作镜子。在中原地区发现

的时代最早的铜镜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四面商代晚期的铜镜。圆形，有的背面铸有叶脉纹、连珠纹等纹饰，中央有半环形钮，制作粗糙。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铜镜发现也很少，说明在青铜礼器发达的时期，青铜生活日用品的生产是不发达的。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封建制的最终确立，青铜礼器衰落了，而铜镜等日常生活使用的青铜器的生产大为发展起来，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例如在湖南长沙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楚墓，约四分之一都随葬有铜镜。楚国的铜镜主要有山字纹镜、蟠螭纹镜、四兽纹镜等，往往以细密的羽状纹作为地纹，制作十分精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铜镜可以作为中原地区的代表，工艺十分精湛，有金银错镜、镶玉嵌琉璃镜、镜面与镜背分别用含锡量不同的青铜制成的复合镜等。此外还有武士骑马持剑与野兽搏斗的狩猎纹镜等，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十分生动。

在日用生活品中，铜带钩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铜带钩是革带（腰带）上的带扣，一般为琵琶形，前端较细，做

成钩首,后端粗圆,背面有圆钮。钩首与圆钮分别扣入革带两端的孔中,用以束腰。考古发现中原地区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铜带钩,时代早于边区的发现,说明带钩首先是中原地区发明的,而不是北方鲜卑族的创制。战国时期带钩以铜带钩为主,此外还有金、银、铁和玉带钩等。有的制作非常精致,不仅实用,又是精美的装饰品。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包金镶玉银带钩,长18.4厘米,呈琵琶形,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的浮雕兽首,上面嵌有三个白玉块,两端玉块的中心又各嵌有一颗料珠,钩首用白玉制成,

十分精美,代表着战国时期工艺技巧的高度水平。

在日用品中,青铜灯在战国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精品。例如河北平山中山



图 12 战国银首人形灯

王墓出土的树形灯、银首人形灯等。其中银

首人形灯（图 12），高 66.4 厘米，中间是一个站立的身着长袍的男子，头系银质，两眼嵌宝石，面部表现愉悦恬静。右手握一条螭龙，螭龙口衔一个高高的灯柱，柱顶为灯盘。灯柱上又有蟠龙蟠绕，并有一个猴子在攀援。左手亦握住一条螭龙，螭口托住另一个矮灯的灯盘，造型十分生动。战国时期除铜灯以外，还有陶灯与玉灯等。

6 玺印、符节的出现与使用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玺(xǐ 喜)印，但目前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官世禄制度，官吏改由各诸侯国王来任命，任命需要授予凭证，因此，作为官吏身份与权力凭证的官玺也就随之产生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私人之间交往增多，也需要代表个人身份与信誉的凭证，因此，私人玺印也得到了发展。总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作为公私凭证的玺印发展起来了。战国玺印主要用青铜铸造，此外还有玉、银、琥珀、琉璃、骨、角、陶印等。印面形状多为方形，还有长

方形、圆形、椭圆形、曲尺形等。印上有小钮，以备穿系，以便将印佩在身上。印文有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两种，章法布局，古朴巧妙，又是优秀的艺术品。玺印在战国时期主要是用来钤印于封泥之上，用来封缄简牍或物件，防止私拆，并作信验。此外也钤印于帛上或陶器的湿坯上。官玺个体较大，一般边长在2厘米以上，印文多为地名及官名。例如“乐阴司寇”、“司马之玺”、“夏屋都司徒”、“上谷疆丞”等。私玺较官玺个小，一般为姓和名，例如“王买”等。此外还有吉语玺与肖形玺。吉语玺的印文有“出入大吉”、“忠信”、“敬事”、“昌”等。肖形玺印文为各种动物或人的形状，简括生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一般官吏及私人的印只能称为印，从此，一般的印都通称为印了。

战国时期出现的符节是传达王命的凭证，它反映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符，一般指兵符，是调兵遣将的凭证。大多用青铜制成，多为虎形。从中脊剖分为二，一半在国君手中，一半由军队的将领保存。

发兵时，使节必须持有国君手中的一半，前往与将领手中的一半相对，合验“符合”，方为有效。例如战国末年秦国的新郢虎符，上有错金铭文4行40字：“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郢。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毋(也)。”节，一般是通行的凭证。例如1957年及1960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包括车节与舟节，均呈长方弧形，仿竹节之状。车节长29.3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9行147字。共发现3枚，原应有5枚，恰好合成一个圆竹筒形。舟节长31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上有错金铭文9行164字。共发现2枚，原亦为5枚，合为圆竹筒形。它们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发给鄂君启的用船或车运输货物的免税凭证。详细规定了商队车船的数目及通行路线，反映了楚王对封君牟利的限制，也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达。

7 丰富多彩的丝织品

战国时期丝织业有了新的发展。当时

的丝织品以楚国地区发现最多。在湖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经常出土丝织品,尤其是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发掘的战国中期1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堪称为丝绸宝库,可以作为战国时期丝织品的典型代表。该墓出土的丝织品种类繁多,有纱、绢、罗、锦、绣、绦等,质地精良,保存完好。共出土衣著15件、丝衾(被子)4床。在衣被上用朱红、绛红、金黄、棕黄、茶褐、浅绿、深赭、茄紫等色织出或绣出对称的蟠龙、凤鸟、神兽及几何形图案,色彩十分绚丽。例如其中一件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长165厘米,袖展158厘米,袖宽45厘米,下摆宽69厘米。为交领、右衽、直裾式。两袖平直,宽袖口。袍面是凤鸟纹及花卉纹绣的浅黄色绢,袍里是深黄色绢,内絮丝绵,实为一件精美的工艺美术品。

不仅如此,战国时期丝织业的发展为汉代丝织业的繁荣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8 发达的漆器工艺

战国时期漆器工艺有了巨大发展,考

古工作中在当时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域内均有发现,说明漆器的产量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此时漆器的品种大增,门类齐全。有床、箱、案、几等日用家具,耳杯、豆、盘等饮食器具,盒、奩(lián 帘)等妆奁器,鼎、豆、壶、钫等仿铜礼器,鼓、瑟、笙等乐器,甲冑、盾、弓、剑牋、戈矛的竹木秘等武器,车、肩輿等交通工具,以及棺、虎座飞鸟、镇墓兽等随葬品。说明此时漆器已经逐渐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此时漆器的胎骨仍以木胎为主,但出现了竹(篾)胎与夹纻胎。夹纻胎用多层麻布或缙帛制成,轻巧牢固,易于漆液的渗透与粘附。夹纻胎的发明是漆器工艺的一大进步。此外还发现有在铜器、陶器或皮革制品上髹漆的制品。此时并且出现了在器物上加镶用铜或银制或的扣箍,称为釳器。除了有加固作用之外,使器物更加富丽堂皇。此外还在漆器上附加铜铺首、盖、足、鋈等金属附件。

此时普遍在漆器上用红、黄、蓝、绿、黑、金、银等色绘出繁缛的云纹、漩涡纹、菱形几何纹、蟠螭纹及鸟兽纹等,十分华丽。

并且在漆器上往往有漆书、针刻或烙印戳记的文字，其内容有官府作坊名称、工匠姓名或使用者的姓名等。

南方地区由于自然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保存完好的漆器较多，其中有许多精品。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狩猎乐舞神怪龙蛇纹漆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漆盒，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鸟鼓架等。尤以 1965 年湖北江陵望山 1 号墓出土的彩漆木雕小座屏堪称为稀世珍品。由扁平底座及长方形屏面组成，镂空透雕鸾凤、鹿、蛇、蛙等，表现鸾凤与蛇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寓意深远。以黑漆为地，饰以硃红、灰绿、金、银等彩色漆绘，颇为艳丽。

9 列国都城的进一步发展

在上述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中我们已经一并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等国的都城，在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秦都咸阳、赵都邯郸、韩都新郑与燕下都。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 350 年）迁都咸阳。从 1959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

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遗址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以东 15 公里窑店渭河北岸,南北长约 6 公里,东西宽约 4 公里,南部一部分已被渭河冲毁。1974 年至 1975 年发掘了 1 号宫殿建筑基址,建筑在东西长 60 米、南北宽 45 米、现高 6 米的巨大的夯土台基之上。台基呈阶梯形,依台逐层建筑木构房屋,组成多层的高大建筑。出土了大量的龙纹、凤纹、几何纹空心砖,方格纹、米字纹、太阳纹铺地砖,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云纹、动物纹、变形葵纹等圆形瓦当以及陶排水管道等。室内地面和墙壁用草泥土分层涂抹,表面刷白色或红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墙壁上发现了彩色壁画。有大红、朱红、黄、赭、石青、石绿、黑等色,其颜料为矿物质,至今仍很鲜明。在附近的 3 号宫殿遗址也发现了壁画,其内容有车马、仪仗、建筑、人物和麦穗等。这些宫殿遗址均发现有明显的火烧遗迹,与《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放火焚烧秦都咸阳的宫室,大火三月不灭的记载相吻合。

赵国都城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及其西南,由位于西南的宫城(俗称赵王城)及

其西北的大城(廓城)组成。宫城由东、西、北三座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城墙残高8米,城内有龙台、南将台、北将台等十余处夯土台基,系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以西城中部偏南的龙台最大,南北长296米,东西宽265米,高9米,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大的夯土台基。台基处出土有大量瓦片及三鹿纹、涡云纹等圆形瓦当。大城为居民区,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800米,东西宽约3200米。在城内发现有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西北隅有插箭岭、铸箭炉、梳妆楼、灵山等夯土台基。

韩哀侯三年(公元前375年)韩国兼并郑国后,迁都于新郑,在今河南新郑县城及周围地区、洧水(双洎河)与黄水河交汇处。城依河而建,平面不大规整,南北最长达4500米,东西最宽处约5000米,中部由一道南北向的隔墙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又称内城,在中部有一个南北长320米、东西宽500米的宫城遗址。在宫城及其以北发现许多夯土建筑基址,例如其中梳妆台基址,南北长135米,东西宽80米,高8米。

在内城西北部阎老坟村北发现一处冷藏食物的地下建筑基址，室内地下有五口陶井，为储存家畜、家禽肉食的处所。东城又称外城，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窖藏的青铜武器等。在城内发现有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地。1923年在李家楼村曾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大型青铜礼器，前述精美的莲鹤方壶即出土于此。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包括上都薊和下都武阳。根据考古发现，薊城大致位于今北京市外城的西北部，已出土有兽面纹半圆形瓦当、陶井圈及燕国货币易刀等。武阳城系战国晚期燕昭王所建，在今河北易县东南 2.5 公里、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从 1930 年起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8 公里，南北宽约 4 公里，中部有一道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又称内城，其北部有武阳台、张公台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中武阳台最大，东西长约 140 米，南北宽约 110 米，残高达 11 米，分为上下两层。1966 年在城内发现高达 74.5

厘米的建筑饰件青铜铺首衔环，可以想象当年建筑之巍峨。城内还出土有兽面纹、双鸟纹、双龙纹、山云纹等半圆形瓦当。在城内还发现有冶铁、铸造铜镜、钱币及武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内城西北隅虚粮冢、九女台等处还发现有许多大型墓葬，是燕王及高级贵族墓葬之所在。

、 10 诸侯国君墓地的发现

战国时期诸侯国君的墓地已有一些重要的发现，现择要予以介绍。

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现了战国初期曾侯乙的墓葬。曾国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国，但墓中却出土了上万件精美的器物。如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此外该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馈鼎9件、簠8件、簠4件、大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盥缶4件等。形体巨大，制作精致。例如大缶高达1.30米，腹径1.10米，重达360公斤。尊盘系用失蜡法铸造，十分繁缛而精美，堪能代表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发展

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武器和车马器。该墓出土的青铜器的总重量达 10 吨之多,足以反映战国时期青铜产量之巨大。尤其是除铜编钟外,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外还出土有金盞、金杯、金带钩及长达 48 厘米的成组的玉佩饰等,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

1950—1951 年发掘的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中期魏国的王陵,坐落在共山下的一个南北长 135 米、东西宽 150 米的高台地上,其上三座大墓并排在一起,是魏王及王后的陵墓。其中以居中的 2 号墓为最大。墓室正方形,上口长宽各为 15 米,深约 17 米。椁室长方形,长 9 米,宽 8.4 米,高 2 米。棺置于椁室之中,椁室外面积砂积石,用以防盗。墓口上建有夯土台,在台上建有享堂,平面正方形,每边长 27.5 米。经复原是一座七开间四角攒尖的瓦顶建筑。此外,在 1 号墓享堂东南部散水下面发现了两个埋藏祭玉的小坑,其中有玉简策、玉圭与玉璜等。这些说明此时墓祭已经产生。2 号墓

被盗严重,1号墓出土成套的仿铜的陶质礼器,有升鼎9件、簋2件、壶4件、鉴4件、盘1件及匱1件等,这说明传统的礼器制度已大为衰落。在1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有放置车马的墓室,表明自西周以来在大墓旁另建车马坑的制度已经改变。

1933年、1935年和1938年三次被盗掘的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王墓,墓上有周长300余米、高约2米的封土,下为长方形土坑墓室,墓室中部东西长约21米,南北宽约17米。墓室中部为木构椁室,推测长约11米,宽约9米至10米。中间放置长约3米、宽约1米、高约1米的朱红色木棺。墓中出土千余件青铜器,形体巨大。著名的有楚王熊章剑、楚王熊肯鼎、楚王熊悍鼎及曾姬无恤壶等。其中楚王熊肯鼎,高59.7厘米,口径60.5厘米。楚王熊悍鼎,高53.8厘米,口径45.9厘米。盖与器上共刻铭文66字,其中有“楚王熊悍战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镈鼎,以供岁尝。”据研究此墓可能是卒于公元前228年的楚幽王熊悍的陵墓。

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掘了战

国中期中山国王的陵墓,其中以中山王错墓(1号墓)最为重要。墓上建有高大的封土与享堂。椁室两旁有藏器坑放置随葬品。西边的藏器坑出土了青铜礼器列鼎9件、簠4件及鬲、豆、壶等。其中最大的一件中山王错铁足铜鼎,高51.5厘米,口径42.7厘米。腹部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同出的中山王错方壶,腹部刻铭450字,盂匜壶,腹部刻铭182字。这些铭文内容丰富,除记载中山国的世系外,还记载了中山国参加了公元前314年齐伐燕的战争,并且“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该墓还出土了青铜兆域图版,长方形,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上面是错金银的中山王陵园平面图,图内还有铭文460字,包括中山王命管陵的诏书及各陵的位置及尺寸等,对研究战国时期的王陵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墓中还出土了许多工艺水平极高的青铜制品,如错金银龙凤铜方案座、错银双翼神兽、错金银虎噬鹿器座等,栩栩如生,极为生动。根据文献记载,中山国是北方鲜虞族建立

的国家。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青铜帐钩等反映游牧生活的物品,但大量的器物则与中原赵、魏文化一致,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11 简牍、帛书和帛画

建国以来在楚、曾、秦等国的墓葬中,由于当地地下保存条件较好,出土了几批战国时期的简牍。主要有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几批竹简,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竹简以及四川青川战国时期秦墓出土的木牍等。这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简牍。简牍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使用的主要的书写材料,简是修治好的细长竹片,牍是修治好的较宽的长方形薄木板,在上面用毛笔书写文书。其中年代最早的是战国初期(公元前433年或稍晚)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共计240余枚,6600余字。简长72—75厘米,宽约1厘米。内容记载用于丧仪的车马兵甲,属于“遣策”一类。遣策即墓中随葬品的清单,是竹简中最常见的。例如湖南长沙仰

天湖 1 号墓及湖北江陵望山 2 号墓出土的竹简,可与墓中随葬品相互对照。而在信阳长台关 1 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组 108 支竹简,约 600 字,内容有“周公”、“先王”、“三代”等,反映了儒家的思想,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真正的书籍。此外,湖北江陵望山 1 号墓出土的竹简中,又有记载墓主人患病期间进行占卜及祭祀祷告于神祇及祖先等内容。青川木牍内容则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 309 年)命丞相甘茂等修订的《为田律》等。

楚帛书,1942 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书写于白色丝帛之上,长 47 厘米,宽 38.7 厘米。中间有墨书两段,一段 8 行,一段 13 行,方向相反。内容提到伏羲、女娲、共工、禹、契等,还涉及天象灾异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可能是数术性质的佚书。周围用彩色绘出 12 个神的形象,有的三头,有的鸟身等,旁边题有神名,与《尔雅·释天》12 月名相合。每个神旁附有一段关于本月宜忌的文字。四角又绘有植物枝叶图象。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除用简牍外,还用丝帛作为书写材料,楚帛

书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用丝帛书写的书籍。

楚帛画，已发现两件。一件为 1946 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画在白色丝帛上，长 31 厘米，宽 22.5 厘米。画一个侧立的女子合掌立于新月形物体之上，左上方有一龙一凤。另一件 1973 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之中，与上述楚帛书出于同一座墓中。长 37.5 厘米，宽 28 厘米，上缘包裹着一根细竹条。上面绘有一个男子驭龙而行，龙作船形，下面有鱼，后面有鹤。据研究，帛画上的人物就是墓主人的肖像，帛画的内容是表示墓主人的灵魂在神灵动物的引导下飞升登遐，与当时流行的神仙思想有密切关系。这两幅帛画代表了战国时期绘画达到的高度水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六 商周时期边区的 青铜文化

商周时期,中原周边地区在中原商周王朝先进的青铜文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进入青铜时代,他们创造的青铜文化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根据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择要予以介绍。

1 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 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在北方燕山南北的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及天津等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其时代大致属于夏商时期,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前1500年。考古学家因其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下文化层,所以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据《左传·昭公九年》的记载:“昔武王克商,……肃

慎、燕亳，吾北土也。”它可能是夏商时代肃慎与燕亳族的古代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其中有的是来自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例如 1977 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出土的鼎、鬲、甗、爵、斚、卣及铁刃铜钺等。此外还有当地制造的青铜小刀、耳环与杖首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了较多的金制品。上述平谷刘家河墓葬中就出土有金笄、金臂钏及金耳环等。其中金耳环上部弯成半圆形，下部为圆形坠，高 3.4 厘米，坠部直径 2.2 厘米，重 6.8 克。经检验，含金量为 85%。此外，还经常发现玉璜、玉珠、玛瑙珠与绿松石珠等装饰品。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石铲、锄、镰、斧等。在村落周围发现有用石块垒砌的围墙及壕沟等防御设施。在村落旁边有墓地，大多数是小墓，但已出现了少数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并随葬有表示身份的制作精致的石钺，说明已经产生了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大墓中还随葬有精美的彩绘陶鬲、罐及鬻（guī 规）、爵等，上面绘有兽面纹等，显然是受到

了中原夏商文化的强烈影响。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西周、春秋及战国时期分布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的燕山以北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因其首先在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而命名,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1000 年至前 300 年。此时青铜器数量大增。生产工具有斧、凿、刀等,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例如铜斧为釜斧,中间为圆釜以安木柄,上下为窄刃。武器中以青铜短剑最具特点,剑柄和剑首常铸有动物形纹饰,剑身有曲刃和直刃两种。青铜装饰品有铃形、鸟形、双尾形及连珠形铜饰。特别是出现了仿照中原青铜礼器而铸造的青铜鼎、鬲与豆形器等,器形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例如鼎为敛口、浅圆腹,口沿两旁有半圆形小耳,底下为三个细长尖足。同时也发现有中原生产的铜鼎、簋等。这些都说明此时北方地区与中原青铜文化的联系已远较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密切。

夏家店上层文化有的墓葬形制较大,例如 1963 年辽宁宁城南山根发掘的 101 号墓,长 3.8 米,宽约 2 米,用砾石垒砌成

石椁。墓中出土青铜器 500 余件，其中青铜礼器既有中原生产的鼎、簋等，又有当地生产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鼎、鬲等。此外还有铜镜及金环等，说明这是一座贵族首领的墓葬。它与一般仅随葬几件陶器的小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此时北方地区的奴隶制已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是东胡族的文化。

1985 年至 1989 年在北京延庆军都山南麓发掘了几处春秋至战国初期山戎族的墓地，其中以玉皇庙墓地规模最大，面积约 22000 平方米，共发现 407 座墓葬。以小墓为主，也有少数大墓。其中以 250 号墓规模最大，死者为一位 25 岁的男性，两耳戴弹簧形黄金耳环，颈下佩半月形金璜，腰间佩戴直刃青铜短剑及铜削。椁室内随葬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鼎、敦、盘、匜及当地生产的双耳釜等。在墓葬的填土中埋祭有马、牛、羊、狗等。这可能是一位贵族首领的墓葬。整个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生产工具有刀、铤、凿及骨柄铜锥等。武器中以直刃青铜短剑最具特色，而且使用普遍，在上百座墓葬中都有出土。从其总的文化面貌

来看,既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较为相似,又与中原燕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2 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

甘青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铜器,在甘肃的马家窑文化中已经发现了小件青铜器,例如1978年在甘肃东乡林家出土了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青铜刀,含锡为6—10%。其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740年。在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时期,小件铜器有了更多的发现。例如1957年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铜刀、锥、凿、环等23件,经化验,铜锥、刀含铜99.63—99.87%,系红铜制品。其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1976年在青海贵南尕斯库勒台遗址出土了齐家文化的青铜镜,形制纹饰与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者相近。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甘青地区已发现的青铜文化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与沙井文化,下面分别予以简介。

辛店文化因为首先在甘肃临洮辛店发

现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中下游地区,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辛店文化的彩陶发达。一般是在陶器表面先涂一层白色或红色的陶衣,然后再在上面绘上黑色或红色花纹,有S形纹、涡形纹、双勾纹、平行纹、折线纹



图 13 辛店文化彩陶罐

等。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彩陶罐(图13),高19.6厘米,口径11.8厘米。颈部有双耳。肩部用黑彩绘出双勾(羊角)纹。辛店

文化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冶铜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甘肃临夏张家咀遗址出土了青铜容器的口颈部残片,说明此时已能生产大件容器。此外还发现有铜凿、锥、匕、矛及装饰品等。辛店文化的陶鬲与西周陶鬲接近,彩陶上的云雷纹与中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接近,这些都说明辛店文化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已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寺洼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临洮寺洼

山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肃兰州以东地区,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400年至前1100年。青铜武器发现较多,有戈、矛、刀、镞等,此外还发现有铜铃、铜镯及铜泡等。居民主要从事农业。马鞍口双耳陶罐是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陶器上还发现了一些刻划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在寺洼文化中发现了盛骨灰的陶罐,说明当时已有火葬。根据古代文献关于古代氐羌族实行火葬的记载,推测寺洼文化可能是古代氐羌族的文化。

卡约文化,又称为卡窑文化,因其首先发现于青海湟中卡约而命名,主要分布在甘青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其年代约为公元前900年至前600年。发现的铜器有斧、锥、刀、镰、戈、镞、环等。居民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主要是石铲、骨耜、石斧等,粟(小米)为主要粮食作物。在青海循化苏志发现两个用夯土筑成坟丘的墓葬。坟丘呈椭圆形,长径分别为20米和24米,高1.5米。两个坟丘内分别有16座和10座单人墓葬,这种特殊的葬制比较少见。

沙井文化,因其首先在甘肃民勤沙井

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张掖、武威至永登一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800年至前600年。发现的铜器有刀、三棱镞、铃及鹿形、鹰头形等装饰品，从铜刀与铜镞的形制来看，与中原青铜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永昌双沟发现了一座沙井文化的城址，平面呈三角形，南北长154米，东西最宽处为132米，城墙残高4米，城门向南。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大多是在红色陶衣上，再绘以红彩花纹，其中绘有鸟纹彩带的陶罐最具特色。

3 四川及其邻近地区的巴蜀文化

商周时期，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存在着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巴蜀文化。巴文化主要分布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地区，蜀文化主要分布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地区。巴蜀文化不仅二者自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中原青铜文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与古代文献记载蜀国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等是相一致的。

巴族最早的发源地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流域,以后主要活动于四川东部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一带。西周时期建立巴国,都于重庆等地。春秋时期比较强盛,与楚国关系密切。战国时期衰落,公元前316年被秦国灭亡。巴文化的青铜武器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如扁茎柳叶形剑、空首折腰钺、圭形援直内戈、短骹弓耳矛等。青铜饮食器有釜、甑、簠等。青铜乐器以铎于和钲为常见。青铜器上常以虎纹作为装饰。并且在青铜武器、乐器及印章之上也常铸有虎形、鸟形、手形、花蒂形等符号,可能是古代巴族或蜀族的文字,但至今尚未通识。巴文化墓葬的特点是船棺葬,即用长约5米的整段楠木雕凿成船形,尸体置于船舱之中,葬于沿江的山坡之上。1972年涪陵小田溪战国时期巴国墓葬中出土14件成套的青铜错金编钟与铜缶等,与楚国青铜器相一致,反映巴文化与楚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蜀人最初活动于岷江上游的山区,以后逐渐向成都平原发展,根据考古发现,在商代晚期已形成强盛的地方国家。在四川

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城址，略呈梯形，总面积约为 2.6 平方公里，城墙系用夯土筑成。1986 年在城南三星堆发现了两个祭祀坑。一号祭祀坑长 4.6 米，宽 3.5 米，深 1.64 米。坑内埋有青铜器、金器、象牙、玉石器 300 余件及大量的海贝与烧骨。二号坑长 5.3 米，宽 2.3 米，深 1.55 米。出土青铜器、金器等 600 余件。据研究，这些物品是在举行燎祭仪式后，埋入坑内的。青铜器包括礼器、神像（偶像）、神树及武器等。礼器有尊、罍、盘等，与中原商代青铜礼器十分相似。青铜神像是建国以来的首次发现，其中一件青铜立人像，赤足站立于高座之上，通高 2.62 米，人像高 1.72 米，重 180 余公斤。身体修长，两臂抬起，双手握成圆圈，身穿左衽长袖深衣，上饰龙纹及兽面纹图案。此外还出土了各种大小的青铜面具，其中 1 件大型面具高 65 厘米，宽 138 厘米，两个眼球呈圆柱状，凸出约 30 厘米，耳长尖，十分奇特。玉器有圭、璋、璧、琮等。金器有杖、面罩、虎等，1 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金皮木芯，长 1.42 米，金皮重约 500 克，其上雕有人头、鸟、鱼等图案。此外

在成都羊子山发现了一座祭坛基址,在成都十二桥发现了大面积竹木建筑基址。1980年在新都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期蜀国大墓,出土的青铜礼器鼎、豆、敦及编钟等与楚国青铜器类似,显然受到了楚文化的重大影响。公元前316年蜀国被秦国灭亡。

4 江西的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因其首先在江西清江吴城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江西北部,其时代大致相当于商代及西周时期,是一种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有刀、斧等,并发现35件铸造铜斧、凿、刀等用的石范,与中原地区所用陶范不同。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墓室内有一椁一棺,椁室长8.22米,宽3.6米,棺长约2.34米,宽0.85米。墓中随葬青铜器480余件,包括礼器、武器与工具等。其中有些器物形体巨大。例如一件青铜甗,高达1.1米,重78公斤。一件大方鼎,高0.97米,重49.2公斤。一件四羊罍,腹径61厘米。其器形与纹饰均与中原商代晚期青铜器类似,说明它与商文化有着密

切的联系并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是，有些器物，例如青铜钺、短剑、单翼镞形器、半圆形凿、手斧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并且在器物上还常见虎形立雕装饰。此外，墓中还出土了玉琮、玉璧、玛瑙套环羽人饰品以及几何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等 300 余件。据研究，墓葬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墓主人可能是当时地方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吴城文化的陶器及石范上还发现有大量的刻划符号或文字，大多每件器物上刻一二个，最多的在一件陶器上刻有 12 个符号或文字。据研究，其形体结构可能受到商代甲骨文的影响，但至今大多不能认识，也可能是当地的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

5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广东、广西、福建与台湾在商周时期是古越人的居住区，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进入了青铜时代。其青铜文化的特点是既有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又有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而青铜工具与武器有着鲜明

的地方特点。此外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西周,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发达的表面饰有几何形印纹的硬陶器,以罐为最多(图14),还有豆、碗、盘等。此外石器以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镞最具特点。下面分别予以简介。



图14 西周印纹硬陶带柄罐

广东地区,1974年在信宜发现一件中原生产的西周中期的青铜盃,表明此时已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1962年、1963年在清远发现两座春秋时期的墓葬。1号墓出土青铜鼎2件、簋1件及编钟1套(现存5件)等。2号墓出土青铜编钟1套7件、青铜壘1件及铜钺、矛、匕首、斧等。其中青铜壘是中原生产的,而青铜鼎则是当地制造的,特点是浅腹,三个细高足外撇,通称越式鼎。此外,刃部呈扇形、整体像靴形的铜钺,柄部铸成插腰站立人形的铜匕首等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另外,在肇庆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晚期的墓葬,随葬青铜器多达一百余件,说明广东

的青铜文化到战国中晚期时已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水平了。

广西地区,建国以来在武鸣、兴安、横县等地出土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卣和钟等,反映当时已与中原有了联系和交往。到了春秋时期,广西青铜文化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1971年恭城发现的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铜鼎5件及尊、鬯、编钟、钺、剑、戈、斧等33件。其中铜鼎既有中原生产的蟠虺纹鼎,又有当地制造的越式鼎。值得注意的是铜尊,形制为敞口垂腹式,是中原西周中晚期时常见的形制,而其纹饰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双蛇斗蛙纹等,说明这是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此外,铜钺也是扇形刃、靴形,与广东清远出土的类似。1974年在平乐银山岭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其中已经出现了铁器,说明到了战国时期,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

福建地区,目前发现较少。1974年在南安大盈发现了一批约为西周时期的铜戈、戚、矛、匕首、铍和铃等。戈的内部较长,后端呈凹弧形;铜铃及铜戚上所饰的网状

纹、曲折纹、波浪纹等，与当地几何形印纹硬陶器上的纹饰一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在建瓯阳泽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铜钟，高 76.8 厘米，重 100.35 公斤，形制纹饰与浙江、湖南出土者类似。此外，在福清东张遗址上层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其中一片上面饰有云雷纹。同出有几何形印纹硬陶罐及原始瓷豆等。

台湾圆山贝丘遗址发现有几何形印纹陶及有段石铤等，与上述福建福清东张遗址出土的相类似，说明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圆山的古代居民也应是古越族的一支。由此可见，台湾在商周时期与大陆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6 云南的青铜文化

根据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云南地区早在商代晚期、西周初期已经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青铜文化已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并有着强烈的地方特点。例如 1975 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的 79 座墓葬，普遍用青铜矛随葬。少

数大型墓葬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例如 1 号墓出土青铜器 110 件,其中有铜鼓 1 件。这种铜鼓与中原商代铜鼓形制不同,竖置,体如圆墩,上为圆形鼓面,束腰,中空无底。万家坝 1 号墓出土的这件春秋晚期的铜鼓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西南铜鼓。直到今天,这种铜鼓一直为西南地区各民族所使用,既是最具有特征的乐器,又是权力、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此外 1 号墓还出土了 6 件一套的羊角钮铜编钟,这也是西南地区特有的青铜乐器。此墓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工具,共计 28 套,每套由 1 件铜斧、1 件长方形锄和 1 件方形锄组成。说明此时青铜工具已经普遍使用。又如 23 号墓,随葬青铜器 577 件,其中大部分是铜矛,此外还有钺、戈、剑、镞、臂甲和盾饰等。说明青铜武器的生产也是很发达的。此外还出土了锄、斧、凿等青铜生产工具及 4 面铜鼓。而大量的小墓,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 1 件随葬品,说明此时的贫富分化已很严重,阶级差别已很鲜明,当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1961 年在祥云大波那发掘的战国中期的墓葬,出土了一具长 2 米、宽 0.62 米、

高 0.64 米的长方屋形铜棺。棺顶作两面坡形，棺身由 7 块铜板组成，由插销扣合，可以拆装。侧面铸有鹰、燕、虎等动物纹饰。随葬有铜鼓、铜钟、铜笙及铜葫芦笙，还有干栏式的铜房屋模型及猪、狗、鸡、羊、牛、马的模型等。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了纯锡制成的手镯，这可能与云南富产锡矿有着一定的关系。

上述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工具和武器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铜锄体为长方形、方形或桃形，斧为靴形。矛多为中部起脊，钺为半月形刃，剑多为花蒂形剑格、圆柱茎上饰有缠络(guō 勾)纹等。但同时出土的铜戈及柳叶形剑等，与中原地区出土者形制相似，说明此时云南地区与中原青铜文化已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受到中原青铜文化一定的影响。

战国中期楚威王时，派将军庆趺率兵攻取巴、黔中以西，至于云南滇池。楚顷襄王 18 年（公元前 280 年）秦国夺取了楚国的黔中郡，阻断了庄蹻的归路，于是庄蹻“以其众王滇”（《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后到了汉代，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家族臣属墓出土的大批的铜鼓、铜贮贝器、各种人形及动物形扣饰,形象地反映了滇人农业、畜牧、纺织、狩猎、战争、乐舞及祭祀活动的情景,说明此时滇文化已经有着高度的发展及卓越的艺术成就。